

※ 研究動態 ※

世紀之交廣州學術考察記

楊晉龍*

一、前 言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四）

本處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廖燕(1644-1705)《二十七松堂集》之際，除受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荒木見悟先生之協助外，復得廣州中山圖書館特藏部副主任林子雄先生及著名文獻家王貴忱先生之協助，纔得以順利完成。後來經學文獻研究同人自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始，執行為期三年半的「清乾嘉學派經學研究計劃」，其中有關劉毓崧(1818-1867)與劉壽曾(1838-1882)《文集》點校之事，亦委由林子雄先生和廣州市地方志館副館長陳澤泓先生負責，雙方雖合作愉快，然實未曾謀面。考阮元(1764-1849)於嘉、道年間(1820-1824)^①在廣州創設「學海堂」，教育學子、刊刻學者著作^②，對乾嘉學術在廣州之傳播與發展，有相當大的作用和貢獻^③。另外歷史上不少學者亦出自廣州，尤其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 楊晉龍，本所助研究員。

① 此指由招收學生授課開始，至書院建築物完成之時間而言。依陳澤泓：〈學海堂考略〉，《廣東史志》2000年第1期，頁33-35所論。

② 「學海堂」所刊刻諸書之書目，可參見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3月），頁330-333所統計。

③ 有關「學海堂」之建立、課程、影響等，參見歐安年：〈阮元總督功德遺嶺南〉，楊萬秀主編：《廣州名人傳》（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頁72-74；李國鈞等著：《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頁882-912；王章濤：《阮元傳》（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10月），頁164-184；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中冊，頁1398-1409所錄諸文；陳澤泓：〈學海堂考略〉，同注①，頁33-38等處所論。

諸事，廣州首當其衝，受害最深，感受最強烈，因此相對於其他地方，當地學者的思想，具有相當大的特色，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可為代表。為實地瞭解廣州學者有關的遺跡、資料及當地相關的學術研究狀況，與林、陳兩位先生當面商討點校諸書之細節，商討清代以來相關資料之收集及蒐輯一九四九年之前、民國以來的經學相關著作，以便寫「提要」，並拜訪王貴忱先生，感謝其熱心協助諸事，另外附帶的則是聞知廣州「學而優書局」可代為找齊全部的《古本戲曲叢刊》，因此想加以瞭解，以便選購本處所缺者。還有揚州大學的戴偉華教授轉到華南師範大學任教，也希望能和我們加強學術交流，諸多原因之匯集，遂有此次廣州學術考察之行。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四)，在林慶彰老師的帶領下，與蔣秋華學長踏上旅程^④。早晨六點正由本院大門出發，經北二高到中正機場，搭乘八點三十五分國泰航空 CX-407 班機，於八點四十七分離地昇空，十點〇三分到達香港機場，轉搭十一點五十五分中國南方航空 CZ-304 班機，於十二點〇二分離地，十二點二十六分到廣州白雲機場，十三點辦好手續，離開機場，乘坐計程車於十三點二十分抵達流花路的「中國大酒店」旅館。由於房間還沒整理好，因此先行用餐，並聯絡林子雄先生見面，直至十四點五十分纔住進房間。隨即與子雄先生前往位於文德路八十一號的「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即「孫中山文獻館」)參觀訪問。十五點二十分抵達，由子雄先生介紹認識該館倪俊明主任，先將帶來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贈送給該館典藏，並表明希望爾後雙方互相協尋需要的資料，倪主任很爽快的答應了，其後他簡略的說明了該館的藏書特色，接著帶我們進行參觀活動，於十六點三十二分左右離開。

二、孫中山文獻館

「孫中山文獻館」的館址，原為昔日帝制時代廣州府學宮故地，學宮始建於北宋紹聖三年(1096)，其後屢有興廢，歷南宋、元、明等朝，至清末遂成為廢墟。一九一二年六月重建，然規模不大。直至一九二七年廣州市政府為了紀念孫中山先

^④ 原本安排計劃研究助理黃智明先生前往，不意出發前一日，其騎機車出了小車禍，被撞傷腳踝骨，需遵醫囑休息，故無法前往。

生(1866-1925)及發展廣州文化，決定創建「市立中山圖書館」，於是派員向南、北美洲粵籍華僑募款，一九二九年遂擇此地作為館址，其「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奠基石，至今猶存，惟「中華民國」四字曾被挖掉，主體建築於一九三三年落成啓用，舊時學宮，遂復為藏書服務學子之所。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攻陷廣州，改為「日本海軍司令部」，一九四六年復館，一九四九年南遷之國民政府曾一度改為「立法院辦公廳」。中共進入後，仍為「廣州中山圖書館」，一九五五年與「廣東人民圖書館」合併，稱為「廣東省中山圖書館」。一九八六年新館建成，此處逐漸成為專門蒐輯典藏廣東相關文獻的專館，其中又以孫中山先生相關的文獻最具特色，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正式以「孫中山文獻館」為名^⑤。

「孫中山文獻館」相對於位於南方而稱「南館」的新館，因位於北方，故稱「北館」，是一座以白色花崗石為基座，仿宮殿式的二層樓混凝土磚造建築物，地基面積六千平方公尺^⑥。門前有個小廣場，面對大門，左邊有一棵百年大樹，右邊是一座種滿蓮花的水池，可能是以前學宮泮池的遺跡^⑦。房子中央有一個八角形的大廳，樣式與南京的「中山陵」相似。一樓是會議廳，二樓地板中間有一圓形大洞，從二樓可以看到一樓。可能同出一個設計者之手，或者是當時流行的設計方式。二樓門上有一「孫中山文獻專藏」之匾，裏面收藏有：孫中山先生好幾種雕像、數十種《三民主義》的版本、革命黨的傳單、會議記錄、國民政府債券、紀念郵票、中山先生和二十二種化名的圖章印譜^⑧、《奉安實錄》等等。據倪主任告知，該館藏有四千多種與孫中山先生相關的資料，包括中山先生的墨寶，如〈孫中山手令〉、〈孫中山致區鳳墀信〉，以及中山先生著作的各種版本、研究中山先生的書籍資料等等。

倪主任接著帶領我們參觀收藏的廣東文獻資料，在櫃檯上看到廣東省中山圖書

⑤ 有關「孫中山文獻館」諸事，參見蔣志華：〈孫中山文獻館館址考〉，《羊城今古》1997年第1期，頁50-54。

⑥ 「孫中山文獻館」建築諸事，參見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頁580-581。

⑦ 該館舊日風貌，可參見李穗梅編著：《廣州舊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8月），頁49的舊照片。

⑧ 有關孫中山先生的化名、筆名、稱號，參見余齊昭：〈孫中山的名號〉，《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9月），頁317-324。

館、珠海市圖書館、澳門文化司署等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到十一月二十日，聯合舉辦的「澳門歷史文獻展覽」的說明書和《展覽書目》，就要了幾份帶回，其中有十三種不同版本的《澳門紀略》，最早的是廣東中山圖書館收藏乾隆十六年(1751)的刻本；七種《香山縣志》，最早的刻本也是廣東中山圖書館收藏嘉靖二十六年(1547)黃佐(1490-1566)等纂修的本子，還有光緒二十三年(1897)修的《蔡氏遷澳家譜》，光緒三十四年(1908)輯的《香山翠微韋氏族譜》，也都出自廣東中山圖書館。澳門最早出版的是藏於澳門大學的《傳家寶》一書，刻於道光十四年(1834)；在一千多種的相關文獻中，只有十一種出自臺北的出版社⁹，此或許是臺、澳關係不深，缺乏交流的必然結果吧！

倪主任帶我們進入書庫後介紹說：該館現藏有新舊廣東文獻圖書（十餘萬種，二十餘萬冊）、東南亞華僑資料（一千多種）、清代史料（二千多種，二萬多冊）、近代革命歷史文獻（四百多種，一千多冊）等廣東報刊一萬一千多種，廣東輿圖近二千幅。其中有廣東新、舊方志一千三百種，舊族譜四百五十多種，以及不少粵人著作的作者簽名本三千多冊。倪主任並希望我們在臺灣幫忙蒐集廣東學者的著作，如果有作者的親自簽名則更佳。他又提到本院故院長吳大猷先生也是廣東人，希望我們能幫忙蒐集吳院長的著作，作為圖書館典藏之用，我們當然願意幫這個忙。民國時期，廣東相關的報刊雜誌和平裝書五萬多種，十二萬冊，其中如全份的《船山學報》(1915-1917；1932-1937)是臺灣少見的。與婦女權益相關的雜誌，至少就收有：《婦女史》、《婦女畫報》、《婦女雜誌》、《婦女新運》、《婦女生活》、《婦女旬刊》、《共鳴》等，可見當時廣州人對婦女教育等相關問題的重視。比較特殊的則如：梁鼎芬(1859-1919)與鄒魯(1885-1954)纂修未成的一百三十九冊《廣東通志稿》。民國清國史館編，收有粵人三五四位傳主的《清史粵人傳》。一九〇五年由高劍父(1879-1951)、潘達微(1880-1929)等創辦的《時事畫報》，一九〇七年革命黨創辦的《廣東白話報》，一九〇八年創辦的廣州方言雜誌《嶺南白話雜誌》，一九一一年革命黨創辦的《平民畫報》。一九〇七年由德國人舒樂主持測繪的《廣東省城內外全圖》，一九三三年廣州市土地局編製的《廣州市經界圖》，以及《廣東省有關南海諸島檔案資料》(1926-1937)、《東西南沙

⁹ 參見王國強主編：《澳門歷史文獻展覽書目》（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9年10月）之記載。

群島資料目錄》(1948)、《南沙群島兵要地志》等。

倪主任又帶我們參觀「杜定友紀念室」，這是專門蒐集典藏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1898-1967)相關文獻資料的專室。杜先生曾於一九二二年兼任廣東圖書館館長、一九二七年兼任廣州市立圖書館籌備副主任，一九四一年受聘負責廣東省立圖書館的恢復工作以後，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因病退休為止，其工作即以加強充實廣州地區的圖書館之收藏為主，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有今天的規模，杜先生之功絕不可沒，因此設立此一專室，以紀念和感激杜先生對圖書館學界的貢獻。杜先生幼名定有，字礎雲，筆名丁右，廣東南海人，出生於上海。一九一八年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畢業，一九二一年以〈中國書籍與圖書館〉、〈菲律賓華僑教育史〉、〈菲律賓華僑教育會改組計劃〉等三篇論文，獲菲律賓大學文學、教育學與圖書館學等三個學士學位，同年五月回國擔任廣州市民大學教授，並出版《圖書館學與教育》一書。其後歷任廣東圖書館館長兼高等師範教授、復旦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協會委員長、上海國民大學創辦人之一、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廣東省人民圖書館館長、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等職，一九二二年撰寫《世界圖書分類法》一書，成為至今許多圖書館分類圖書的依據。綜其一生，共撰寫專書八十六種，已出版者五十五種，單篇論文五百一十二篇，已發表者約三百二十篇。其中與圖書館學相關的專書有四十多種、論文一百二十餘篇，由此可見其對圖書館學界的貢獻^⑩。紀念室除牆上掛有杜先生的大型半身彩色油畫像、相關活動圖片外，還收藏有杜先生之手稿、書畫作品等，以及其女杜燕所撰的《回憶錄》。其中有杜先生用鋼筆寫的「毫字書」，必需用放大鏡纔能看清楚，字雖細微而筆劃工整有致，前輩學者之用心凝志，令人佩服。倪主任告知猶未完全準備妥當，但已甚具規模矣。

^⑩ 有關杜定友先生的生平等資料，參見李聖平主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杜定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頁214-215；張世泰、倪俊明先生：〈近代圖書館事業的開拓者杜定友〉，楊萬秀主編：《廣州名人傳》，同注^③，頁371-376；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等編：《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杜定友》（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年10月），頁139-140；邵延森主編：《辛亥以來人物年里錄·杜定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頁334；黃仕忠編：《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31引《中大嚮導》（廣州：學術新潮出版社，1941年），第3章，改題〈學府人物〉之介紹。

三、廣東省博物館

離開「孫中山文獻館」後，倪主任和子雄先生於十六點五十分陪我們到達位於文明路二一五號的「廣東省博物館」，經過的馬路兩旁，鄰街的房子皆在整修，子雄先生告知，這是為了迎接明年大陸「全國運動會」之故。鄰街的房子和臺灣一樣，皆有「騎樓」之設計，蓋因南方多雨之故也，不知廣東其他地方是否也如此？「廣東省博物館」的前身是清代科舉的試場；是民國十三年一月孫中山先生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創建廣東大學、亦即民國十五年七月正式改名中山大學的校本部；也是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的地方；更是蔣中正(1887-1975)民國十七年誓師北伐閱兵之地，從這些輝煌的事蹟，就可以看出此地的歷史價值。踏進大門往前直視，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四層樓高，四方塔形，中西結合，瘦瘦高高，頂上還裝有尖尖的避雷針，磚木結構建築的鐘樓^①，樣式與臺北總統府頂掛國旗的尖塔差不多。鐘樓的門外邊有一道鐵欄杆圍牆，圍牆與房子之間，是一小片長了許多棵高大樹木的園子，圍牆外到大門約有五十公尺長、十公尺寬的水泥地，左邊是一道磚砌的圍牆，圍牆上畫著一大幅彩色的廣東省風景名勝的山水畫，圍牆的另一邊，就是進入中山圖書館新館之路。右邊則是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即所謂「革命廣場」，「廣場」的最右邊即「誓師臺」，「廣場」靠近大門處，陳列了好幾門明、清時期的鐵炮，據說其中三尊在中英鴉片戰爭時，曾經擊退過英國侵略者。又有一塊三百多年前墜落在英德縣的隕石，據說有四千公斤。

進入建築物內，由於時間已晚，工作人員早已下班，無法入內參觀。該館的珍藏：如宋代陳客的〈墨龍圖〉、明代顏宗作的〈湖山平遠圖〉、清代郭蘭祥的「猴王端石硯」、刻於隋代大業五年(608)的〈劉猛進碑〉等等^②，自是無緣見面了。首先看到的是掛在門兩邊的暗紅色長方形的木匾，右邊直書「中國國民黨一大會議

^① 按：「鐘樓」和附近地形之原貌，參見李穗梅編著：《廣州舊影》，同注^⑦，頁43之舊照片。

^② 有關「廣東省博物館」相關資料，參見黎先耀主編：《中國博物館指南》（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8年10月），頁355-356；《廣州市文物志》編委會編著：《廣州市文物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年2月），頁274-276。

舊址」十一字，從玻璃門往內瞧，看到的是：一九八四年恢復的一樓禮堂內「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座位席次。在白色的桌巾上，寫上每位代表的名牌。主席背後的牆上，高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及中國國民黨的黨旗^⑬。門的左邊則是掛著「魯迅紀念館」的木匾，民國十六年魯迅(1881-1936)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時，曾居住在此鐘樓內，故在一九五七年闢建為紀念館，恢復了魯迅原有的臥室和書房，也陳列了魯迅在中山大學內相關的文獻資料，以供愛好者憑弔^⑭。由於無法入內，因此在照相留念以後，就離開了。走出大門，子雄先生指著馬路對面（文明路二四六、二四八號）的房子說：「越南共產黨官員來中國訪問時，多數會到那屋子憑弔一番。」因為胡志明(1890-1969)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剛從莫斯科到廣州，取名李端，擔任蘇聯鮑羅廷(1884-1951)的翻譯時，即利用該地作為訓練基地，訓練越南共產黨青年，以為反抗法國侵略者的骨幹。胡氏總共舉辦過三期的「越南青年政治訓練班」，培養越南反抗法國侵略的革命幹部，這些人後來多數成為越南人民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就現今的越南政府來說，胡志明是他們的開國領袖，當然要來憑弔一番了^⑮。

四、中山圖書館

「中山圖書館」位於文明路二一三號，與「廣東省博物館」因為僅有一牆之隔，所以在十七點即到達其大門口，由大門口到達圖書館前，是一條寬約十公尺、長約五十公尺的水泥路，路的左邊是民房，另一旁有一道牆與「廣東省博物館」相隔，牆邊栽種了一些花樹，圖書館門前是一個廣場，還有一些販賣食品的小店舖，我們到的時候剛好是閉館日，所以沒有營業。進入館內時，守衛的老先生也非常盡責的告知是閉館時間，所以不准進入。該館的樓地板面積有三八八六〇平方公尺，共有一千五百個座位，開放時間約在上午八點十五分到下午八點四十五分之間（各

^⑬有關「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諸事，參見《廣州市文物志》編委會編著：《廣州市文物志》，同前注，頁69；余齊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若干史實考〉，《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同注^⑧，頁230-239。

^⑭參見黎先耀主編：《中國博物館指南》，同注^⑩，頁271-272所論。

^⑮詳細情形，參見《廣州市文物志》編委會編著：《廣州市文物志》，同注^⑩，頁74-75所言。

室稍有不同），休館日是星期四下午，藏有中文圖書一百二十萬冊（臺、港、澳出版品約五萬冊），其中約三十萬冊是採「開架式」服務。根據子雄先生告知：本來建造圖書館時，就考慮與「博物館」連成一氣，故有「西圖東博」之說，後來則因各單位本位主義作祟，以至於用圍牆隔開，大非原來設計者之意。圖書館是一棟四層樓高，中間有中庭花園，建築物環繞在四周的現代化混凝土磚造建築物，各房室的採光均佳，於一九八六年落成開放，稱為「群樓」，分南、北兩棟。當時纔花費人民幣二千九百萬，如果換成今天來蓋，經費大概要增加五、六倍以上。

該館經過杜定友先生等人幾十年的經營，以及梁鼎芬、黃蔭普(1900-1986)、黃子靜、王貴忱、何文廣、何建華、容庚(1894-1983)諸先生與後人的捐贈，現在包括「孫中山文獻館」在內，共收藏書籍、金石拓片等三百七十多萬冊(件)，其中平裝新舊書二百三十萬冊；線裝古籍三十八萬五千冊；外文圖書二十萬冊；中外文期刊二萬六千種，三十八萬冊；中外文報紙二千四百種，十三萬冊；廣東地方文獻五萬五千多種，十三萬冊(包括廣東新舊地方志一千三百種、舊族譜四百十一種)。和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是：「特藏部」，其中藏有古籍珍本、善本等二萬多冊；普通古籍二十多萬冊；金石拓片四千多種；廣東省以外的文獻有：各地地方志二千多種、民國以前出版的叢書五百多種、中文報紙一千三百餘種；一九九〇年以前的臺、港、澳報刊六百餘種。比較珍貴的約有十多萬種，四十多萬冊，包括：善本書一九一八種，一九七八五冊；地方文獻類七萬多種，近二十萬冊；金石文獻類三六五三種，一四二四八冊；拓片五五七種，一二〇〇多件。其中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珣刻，元、明遞修的《臨川先生文集》，係宋刻佳本。元刻本有十三種三五六冊，如：至元年間(1264-1294)刻的《玉海》、《文獻通考》，至大年間(1308-1311)刻的《重修宣和博古圖》等。明刊本有七〇七種一萬零八百九十二冊，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睦㮮所撰《韻譜》一書，為僅存孤本；隆慶六年(1572)刻的《新刊精選醫方摘要》為僅存的兩部之一；天順五年(1461)刻的《大明一統志》、嘉靖四十年(1561)黃佐等撰的《廣東通志》等等。清刻本有五五六種五千四百五十七冊，例如：屈大均(1630-1696)的著作，尤其康熙版的《翁山易外》，藏有存世三套中的兩套。還有釋澹歸(金堡：1614-1680)的《徧行堂集》、陳恭尹(1631-1700)的《獨漉堂集》、梁佩蘭(1632-1708)的《六瑩堂集》、王邦畿的《耳鳴集》、梁朝鍾的《喻園集》、釋大汕的《離六堂集》等等。近現代人的手稿本有六十種二九九冊，如：陳澧(1810-1882)的《東塾初學編》、

三色批校《東塾雜俎》、《思學稿》、《說文聲類譜》、《切韻考》，康有為的《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封面上有容庚手題篆書「康南海先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手稿」十六字。此外還有林伯桐(1775-1844)、曾釗(1793-1854)、林國庚(?-1900)、潘有為、鄧華熙(1826-1916)、黃培芳(1778-1859)、徐榮(1792-1855)、徐灝(1810-1879)、廖廷相(1844-1898)、李宗灝(1862-1921)、丁仁長(1861-1926)、黃慈博(1886-1946)等人之手稿。抄本藏有五六八種五四五七冊，以孔廣陶(1832-1890)的「岳雪樓」抄本較多，有四百多種，如借周季旒所藏嚴可均(1762-1843)、孫星衍(1753-1818)等八家批校的《北堂書鈔》，堪稱一絕。另外藏有明初銅活字印的《李頎集》、康熙年間(1662-1722)味塵軒木活字本吳肅公(1626-1699)的《街南文集》、道光間(1821-1850)安徽涇縣瞿氏泥活字本《泥版試印初編》與《仙屏書屋初集詩錄》等。套印本除明代湖州閔、齊兩家和康熙年間《芥子園畫傳初集》外，還有光緒年間(1875-1908)廣州翰墨園六色套印的《杜工部詩集》，都是難得一見之物。另外與經學相關的著作，至少還有：袁壯行《五經典要注釋》(康熙二十九年文粹堂刊本)、鄭之僑《六經圖》(乾隆九年述堂刊本)、梁紹熙《經學源流大義》(清末鉛印本)、黎遂球(1602-1646)《周易爻物當名》(紅綿詩屋刊本)、鄧子賓《問心錄周易解》(同治十三年乃則堂刊本)、吳懋清(1774-1845)《毛詩復古錄》(光緒二十年廣州學使署刊)、陳澧《讀詩日錄》(民國元年刊本)、桂文燦(1823-1884)《鄭氏詩箋禮注異議考》(咸豐刊本)和《毛詩釋地》(光緒刊本)、黃位清《詩異文錄》(道光二十四年松風閣刊本)和《詩緒餘錄》(道光十九年佇月樓刊本)、鄧翔《詩經繹參》(同治六年孔氏套印本)、康國燿《詩經注》(同治五年刊本)和《詩經串義》(光緒十七年文經堂刊本)、廖翱《詩繹》(光緒四年刊本)、陳善百《詩經注》(清抄本)、黃節(1873-1935)《詩序非衛宏所作說》(民國十九年鉛印本)等^{①⑥}。

子雄先生帶我們上「南群樓」四樓的「古籍閱覽室」，林老師將帶去的《通

^{①⑥} 有關「廣東中山圖書館」南、北兩館之藏書狀況，參見林子雄先生：〈館藏古籍善本地方文獻簡介(草稿)〉(未刊稿)；〈中山圖書館簡介〉，《讀書之旅》(1999年5月20日)，第4版；駱偉主編：《廣東文獻綜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以及「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網頁」：<http://61.140.225.11/zsnew/bgjj.htm> 內相關之介紹。

訊》和《集刊》贈送給圖書館。倪主任送我們他與沈錦鋒先生主編的《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1992年10月)。子雄先生也送我們他與倪主任、李仲偉先生共同編著的《廣州文獻書目提要》(2000年4月)一書,該書收錄自西漢初迄一九九七年間出版有關廣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軍事、地理、科技等等相關的書籍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二種,並有簡要說明其書內容與價值之提要,實為甚佳之工具書。接著子雄先生帶我們進入「善本書庫」參觀,全中國善本書的保管方式似乎都一樣,用樟木作的箱子,一排排的分層堆起來。子雄先生指出其中抄滿各種經書的帛書,就是古代科舉考試時作弊的用品,另外還有唐人的佛經寫本,似乎是梁啟超手抄的《大乘起信論》。容庚一九五六年一月篆書的「康南海先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手稿」封面,顧頡剛(1893-1980)親題送給張西堂的《尚書研究》第三學期講義。最特殊的是一冊由清代著名書法家汪由敦(1692-1758)用黃金粉,以篆書在藍色宣紙上手抄的經折裝《盛京賦》,藍底金字,上面還蓋有橢圓形的「乾隆御覽之寶」印章,可見是獻給乾隆皇帝(1711-1799)之物,所以用黃錦緞鑲裱,相當華麗。另外是一冊寫有滿、漢兩種文字說明,繪圖本的袖珍型經折裝清代〈大駕鹵簿圖式〉,全書長六・四公分、寬四・九公分。書中彩繪祈穀壇、天壇、雨壇等陳設的法駕、騎駕、鑾駕等等的隊形、旌旗、兵器之實際陣仗,繪圖相當精美細緻,顯然是當時宮廷儀仗官專用的圖冊,這應該是僅存的孤本。由於時間已晚,就到樓下中庭花園,子雄先生指出四周二樓走廊外牆上的圖畫,所繪的是中國書籍印刷發展的歷史,由於光線太暗,又有垂下的綠色藤草遮住,因而無法看得很清楚。

十八點到餐廳與王貴忱先生、倪主任會面,王先生贈送《潘景鄭先生書簡》(1995)及《李一氓同志書簡》給大家,林老師也以《通訊》與《集刊》回贈。餐中王先生談編纂《屈翁山全集》之過程,並言及家中藏有孫星衍、阮元、凌廷堪(1755-1809),以及近代一些學人的手稿、書函。王先生又提到藏有萬曆年間(1573-1620)刊刻的《三先生逸書》(徐渭、李贄、袁宏道)等書。林老師打鐵趁熱的提出,希望能有機會觀賞這些名人的手稿書札,王先生也很爽快的答應了。席中林老師又問及胡毓寰(1898-1981)的生平,以及是否有「南方大學」等事。據王先生等告知,的確有「南方大學」,係當時政治性的短期大學,所以很快就解散了,至於胡毓寰的資料會很快找出來給我們¹⁷。這頓飯吃得很有價值,不但獲知了

¹⁷ 倪主任已在十二月十一日將胡毓寰教授之資料,以 E-mail 傳送給我們了。

許多學術訊息，還預約了觀賞名人學者手跡之機會。由於交談愉快，直到二十一點二十分纔回到旅館。林老師馬上打電話給華瑋交待，購買《古本戲曲叢刊》先要聯絡的黃仕忠教授，約定明天在中山大學見面。

五、中山大學

十二月一日（星期五）

早上由林子雄先生帶我們到位於珠海區新港西路一三五號的中山大學，於八點四十分到達，先在校內招待學者宿舍的餐廳用早餐，進入之後，纔發現座無虛席，需要等候纔有位子。餐廳的早餐非常豐富，式樣繁多，不過還是覺得肉片粥最合口味。早餐後即參觀校園。

中山大學前身爲廣東大學。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1924）二月四日下令鄒魯爲籌備處主任，合併廣東高等師範學院、廣東法政專門學校、廣東農業專門學校等三所學校爲國立廣東大學。二月二十一日籌備處正式成立，聘請胡漢民（1879-1936）、汪精衛（1883-1944）、蔣夢麟（1886-1964）、李大釗（1889-1927）、胡適（1891-1962）、吳敬恆（1865-1953）、李石曾（1881-1973）等三十五位爲籌備委員，開辦費用六十萬元。六月九日正式任命鄒魯爲國立廣東大學校長，常年經費八十萬元。六月二十一日校長就任，並開始招生事宜。校本部設在文明路，即前述「廣東博物館」所在地，除預科外，分文科、法科、理科、農科等類招生，第一屆招生全國報名考生一五四八人，錄取三七二人，於九月八日開學，十一月十一日舉行國立廣東大學成立典禮大會，邀請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1877-1925）、許崇清（1888-1969）等籌備委員演講，孫中山先生因準備北上諸事，故無法親臨，乃親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詞爲賀，其後成爲該校之校訓。民國十四年併入廣州醫科大學，成爲擁有文、理、法、農、醫等五科十六個學系的綜合大學。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山先生病逝，消息傳來，三月二十四日即有人在《廣州民國日報》刊登〈改廣大爲中山大學之提議〉之函，廖仲愷亦在三月三十日的國民黨中央會議上正式提議改廣東大學爲中山大學，以紀念中山先生，八月五日廣東大學校務會議亦決議於十一月十一日改名，然未爲政府接受。直至民國十五年六月戴季陶（1890-1948）爲校長，始於六月十九日成立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聘請陳公博

(1892-1946)、蔣中正、郭沫若(1892-1978)等四十人爲委員。林伯渠(1885-1960)、孫科(1891-1973)、陳其瓊(1887-1968)、蔡元培、吳稚暉、顧孟餘(1888-1972)、蔣夢麟、張伯苓(1876-1951)、于右任(1879-1964)等九人爲特聘委員，纔於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正式改名爲「國立中山大學」，當時全校共有教師一五一人，學生一七七一人，其中本科生九四〇人、預科生八三一人。抗戰期間曾先後遷往廣東羅定，雲南澄江，廣東坪石、東江、連縣等地，民國三十四年始遷回廣州石牌。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中共進入廣州，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任命許崇清爲校長，馮乃超(1901-1983)參與學校事務。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許崇清、馮乃超、陳序經(1903-1967)爲正副委員，工、農、醫、師範等學院劃出，原本七學院、三十一系、九研究所，僅剩文、理兩學院八個系，許崇清、馮乃超續任正、副校長。朱謙之(1899-1972)、楊成志(1901-)、王力(1900-1986)等先後離校，兩學院八個系因與嶺南大學合併，故校址也遷往廣州康樂村，即原嶺南大學之校地康樂園，此即今日廣州中山大學之所在地也。著名學者如：郭沫若、馮友蘭(1895-1990)、陳鍾凡(1888-1982)、成仿吾(1897-1984)、許壽裳(1883-1948)、周樹人(魯迅)、孫伏園(1894-1966)、傅斯年(1896-1950)、容肇祖(1897-)、顧頡剛、董作賓(1895-1963)、周谷城(1898-)、杜定友、羅常培(1899-1958)、俞平伯(1900-1990)、陳寅恪(1890-1969)、岑仲勉(1886-1960)、劉節、趙元任(1892-1982)、丁山、梁方仲(1908-1970)、洗玉清(1894-1965)、王亞南(1901-1969)、容庚、詹安泰(1902-1967)、商承祚(1902-)、董每戡(1907-1980)、王季思、王力、楊樹達(1885-1956)、鍾敬文、朱謙之、吳康(1897-1976)、楊榮國(1907-1978)等人，均曾先後在該校任教^⑱。

嶺南大學的前身是美國人創辦於光緒十四年(1882)的教會學校：「格致書院」，光緒二十六年(1900)遷至澳門，稱「嶺南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遷至康樂村此地，民國元年(1912)更名「嶺南學校」，民國八年改稱「嶺南文理科學大學」，一九五二年與中山大學合併，沿用中山大學之名，所以今日的中山大學，

^⑱ 有關廣州中山大學之沿革歷史，參見黃仕忠編：《老中大的故事》，同注^⑩，該書之相關記載；趙亮宏等主編：《中國高校》（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5月），頁549-550；及中山大學網站：<http://www.zsu.edu.cn/>之相關介紹。

實已非昔日之中山大學矣。嶺南大學係由美國人規劃建造，故沿襲美國校園以南北中軸線為中心、兩邊建築對稱的建築模式。校園面積一·二平方公里，建築面積共五十九萬平方公尺。教學區集中在中心區，住宅與宿舍在東側，建築物係由美國建築師設計，採用中西合璧大屋頂的建築形式。比較著名的建築物有：三層的「馬丁堂」（1905年建，今人類學系）、「美國基金委員會」（1912年建，今黨委辦公室）、「校長宿舍」（1913年建，今中區招待所）、「懷士堂」（1913年建，今小禮堂）、「格蘭堂」（1915年建，今教務處）、「護養院」（1918年建）、「榮光堂」（1921年建，今第二宿舍）、「哲生堂」（1930年建，今高分子化學實驗室）、「陸祐堂」（1930年建，今地理系）等^{①⑨}。校園中的高大樹木、如茵綠草，青翠蓊鬱，風景甚佳。

從新港西路的大門進入校區，是一條寬約二十公尺、兩旁種滿樹木的水泥馬路，接著到達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後，豎立著「孫文」題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校訓的鐵架，鐵架後一排大王椰子樹，樹後是由幾間屋頂建有多角形筒狀通氣孔，造型相當別緻的西洋式屋子構成的樓群。繞過房子，後方對準建築中軸線的是一尊孫中山先生一手叉腰、一手往前平舉的全身銅像，這座銅像的由來是：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1868-1934)在中山先生死後，聘請雕塑家牧田祥哉為中山先生雕像，雕像完成後，乃委託當時日本最有名的鑄造家筱原金作翻鑄銅像，共完成同樣大小的銅像四座，銅像連基座共高二·六公尺，其他三座分別放置在北京（中山路的圓環上）、澳門、黃埔軍校內。銅像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日本運抵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從上海運達廣州，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中山大學石碑新校揭幕，一九五四年春移置中山紀念堂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纔安置在康樂園的現址^{②⑩}。銅像四周是經過修剪的低矮樹木圍繞之圓形圍籬，旁邊又有剪成方形與圓形之樹叢，其後則是一座混泥土結構、八角尖頂琉璃瓦建成、內懸一大鐘的「惺亭」，此二字係一九八一年秋商承祚所題。亭之西方有一水泥地上布滿紫色花朵的林間小道，經過樹林後，就看到一座四柱三門三層的牌

^{①⑨} 有關嶺南大學相關資訊，參見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⑥，頁 577-579；余齊昭：《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同注⑧，頁 357；《廣州市文物志》，同注⑫，頁 180-181；《廣州舊影》，同注⑦，頁 50 等之介紹。

^{②⑩} 有關中山先生銅像諸事，參見《廣州市文物志》，同注⑫，頁 271-272。

坊，牌坊的石雕非常細緻，有花、鶴、鳥、馬、鹿、鯉等，基座的兩對獅子，坐在石鼓上，造型與徽州牌坊的倒立式不同，是大耳朵，頸部有鬚，身上無捲毛，正面歪頭，後蹲前站的樣式。牌坊上由右至左橫寫著「乙丑進士」四字，左右兩邊還各立了一座圓形像石鼓的石碑，一座是中山大學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立的「重修乙丑進士牌坊記」，一座是同日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主席等立的「重修乙丑進士牌坊」，兩座石碑皆在說明此一牌坊之由來。此因明代天啓乙丑年廣州有梁士濟等七人同舉進士，遂建此牌坊以表彰之，牌坊本與其他三座明代牌坊——「熙朝人瑞坊」、「總揆百僚坊」、「戊辰進士坊」等稱為「四牌樓」，而與一座清代牌坊——「盛世直臣坊」，同立於中華中路（今解放中路），一九四七年因拓寬馬路而拆除，遂移建於康樂園內，「文革」時又遭拆毀，至一九九九年纔又組合重建^②。牌坊再往西即今為「高分子化學實驗室」的「哲生堂」。

順著小道往回走，經過「惺亭」再往東走，就到達建在小丘上的中山大學圖書館。圖書館創建於一九二四年，即合併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政法專門學校、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和廣東公醫學校等藏書而成的「廣東大學圖書館」，其歷史則可追溯到一九〇六年建立的「兩廣優級師範學校」藏書樓。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除保留的文理學科藏書外，又併入嶺南大學和中南地區其他高等學校的部分藏書，成為一座新的圖書館。現在所看到的總館建於一九八二年，建築面積一四五〇〇平方公尺，有各類閱覽室十五個，約有一八〇〇個座位。另有基礎圖書館、貯存圖書館、各學院分館、系所資料室等藏書場所。一九九九年建成珠海校區圖書館，建築面積有三六〇〇〇平方公尺。截至一九九九年為止，共有藏書及資料約三三四萬冊（件），其中古籍三〇萬冊（件）、普通中文圖書二〇〇多萬冊、外文圖書六〇萬冊、報紙期刊約八千種二十七萬冊合訂本。古籍中有善本二千多種，約二萬五千冊，包括元刻本約十四種。明刻本較多，約有八八〇種，明抄本十九種。清刻本三七一種、抄本三〇二種、稿本六十七種、活字本十七種、套印本三十五種、批校本二七三種，其中不乏孤本、稿本與批校本等珍貴的版本。另外還有朝鮮本一七六種九六八冊、和刻本八十五種八三一冊、石刻拓本三五〇〇〇多件。跟我比較有關的收藏品，如：潘炳綱《詩經庭訓便覽》（乾隆五十九年養正家塾刊本）、葉鈞《重訂三家詩

^② 參見《廣州舊影》，同注^⑦，頁 25；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⑥，頁 348 等處所言。

拾遺》（嘉慶十五年詒谷堂刊本）、曾釗《詩毛鄭異同辨》（面城樓刊本）、陳澧《讀詩日錄》（稿本）、黃節《詩旨纂辭》（北京大學鉛印本）、楊恭桓《毛詩古音諧讀》（民國十七年京華印書局鉛印本）、楊鴻光《銘心齋經說》（民國抄本）、麥仕治《廣州俗語詩經解義》（民國文寶閣刊本）等，均值得一觀。歷任的館長包括劉國鈞（1887-1978）、杜定友、袁同禮、陳一百等，另外周連寬、何多源也曾長期在此工作，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因而有今天的規模²²。

經由子雄先生之介紹，由該館古籍部主任帶領，參觀了該館的「古籍部」，後來也與館長程煥文教授見面，我們將《通訊》、《集刊》贈與該館，該館也回贈《古籍善本書目》。參觀書庫時，翻閱了四川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華族譜集成》，覺得甚有參考價值，應該可以想辦法購置。林老師發現館藏有兩套甲、乙、丙、丁、戊等五本皆全的顧頡剛《尚書研究講義》，就請他們提書出來，翻閱書籍之時，約十點十五分，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黃仕忠教授也到了。林老師又請問他們是否編有非善本的線裝書，以及清代學者文人之著作目錄，可惜沒有。由於不是熟識的關係，不好打擾太久，所以很快就離開了，希望下次有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好好的利用此地的藏書。大約在十點三十分到達中山大學大門西邊的「學而優書店」選購書籍，除由黃教授請吃午餐外，一直在書店內尋找需要的書。這是由黃教授的夫人負責經營的書店，黃夫人也是中山大學哲學所的碩士，後來離開學界而經營書局，因為文化水平較高，對書籍的認識較深，對市場訊息的掌握較正確，企業管理的觀念也較先進，所以經營得相當成功，黃教授說他得到的最大好處是：自己需要參考的書籍，比較容易獲得。午餐時，黃教授告知廣東現在最有名的食品——黃金糕，是專利產品。所以非常受市場歡迎的原因，一則甜而不膩，再則金黃的顏色順眼，三則名稱又是大家喜歡的「黃金」故也。找書之際，發現楊貞德交代購買的《瞿秋白全集》，雖有書卻不全，書店答應找全後送到飯店，隔天果然和寄書的收據一起送到，這種服務態度，即使在臺灣也非常難得，怪不得「學而優書店」的市場占有率，幾乎是整個廣州書籍市場的一半。大約在二點多離開書店，由子雄先生陪同前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赴三點鐘的約會。

²² 「中山大學圖書館」之敘述，參見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1982年）；駱偉主編：《廣東文獻綜錄》，同注²⁰；又中山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library.zsu.edu.cn/introduce.html> 之介紹。

六、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位於天河西路三六九號，是一棟八層樓現代化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門口除有一白底黑字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木匾直式招牌外，大門上另有葉選平所題橫額，由左至右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該院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七四年六月改稱「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八〇年九月擴建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在設有文學、哲學、歷史、經濟、法學、孫中山、臺灣、港澳等十六個研究所或中心，每一所大約有十名左右的研究人員，並設有研究部，一九八八年起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一九九九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出版的刊物有《廣東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情報資料》等，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品有：《嶺南現代文學史》、《東南亞華文戲劇概論》、《從關閉到開放——晚清洋務運動透視》、《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廣東通史（古代上卷）》、《簡明廣東史》、《孫中山思想研究》、《孫中山辭典》等，歷來研究人員出版專著三百餘部、論文一萬二千多篇。

由於在臺灣拜讀過章權才先生的大作——《兩漢經學史》、《宋明經學史》等書；前次到安徽考察訪問時，從孫以昭先生處得知章先生係周予同（1898-1981）之學生^②。因為熟悉度較強，且研究之範圍亦較相近，所以此次拜訪，實以章先生為主要交流對象。不過章先生相當熱情慎重，還特別邀請其他單位的研究人員，舉行了一次小型座談會。社科院出席的除歷史所所長章先生外，還有中山所副所長王傑先生、哲學所所長王逢文先生、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范海泉先生、歷史所副所長李慶新先生與劉曼容女士。章先生首先簡介歷史研究所，謂該所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主要以近現代史、廣東地方史、港澳史、文化史等的研究為主，現有研究人員十八人。章先生又非常謙虛地表示他的「經學史」著作，是在資料不齊全下的私人研究，希望我們能提供意見。不過我倒覺得在大陸極度貶抑中國傳統文化之際，尤其是代表腐敗的封建思想的中心——經學——的氛圍之下，章先生願意花時間做這

^② 參見拙著：〈千里尋跡安徽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2期（2000年6月），頁163。

類不但沒有榮譽、利益可言，相反的還有可能為自己帶來麻煩的工作，實在令人佩服，姑不論其內容、觀點的表現如何，僅此對老師學術的傳播發展（章先生係周予同之學生，而周先生主張必需研究經學史）、對學術的執著，就值得肯定。接著林慶彰老師簡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的成立與宗旨、現有的研究狀況與研究成果、清代乾嘉經學研究的概況。蔣秋華學長報告其研究《尚書》的心得、研究方法、成果。楊晉龍除說明此次到廣州，主要是當面感謝王貴忱先生、林子雄先生等學者對學術的熱心，並希望更進一步的加強合作，在資料上互相協助提供外，也報告自己研究詩經學史的方法，與傳統選擇幾位所謂名家的研究成果為主，而大談某一時代長時期的經學如何發展的研究方式不同；是一種相對於傳統經學史研究方法，比較整體性的研究方法，主要的理論根據有二：一是「完形心理學」的部分加上部分不能等於整體的概念。一是從「傳播學」的角度，運用統計的方法，以瞭解某家經學觀點，如何被接受的實證性研究方式。范海泉先生簡介「臺灣研究中心」說，該中心於一九八八年七月成立，一九九二年改為今名，現有研究人員五人，主要研究的是臺灣的歷史、法律、經濟、中小型企業、兩岸關係、兩岸經貿關係、臺灣的黑社會、一國兩治等問題，本來還有一位研究臺灣文學，不過現在已經退休了。歷史所劉副所長說，該所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流較多，曾經參加過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的孫中山學術討論會，該所現在研究的有：明清經濟史、廣東經濟史、港澳政治制度、孫中山與國民革命、革命軍史、近代中國思潮、鴉片戰爭前後今文經學的發展狀況等。哲學所王所長說，該所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現有研究人員十位，主要研究的重點是：西方哲學、西方涉及中國哲學的相關問題，非常關注現實問題的探討，所以特別注意改革開放後的文化建設、思想建設、鄧小平思想、大陸面臨的熱點問題等等。楊晉龍請教王所長在調查研究廣州現實的教育問題時，有沒有發現像臺灣的「讀經運動」一類團體的存在？並順便介紹《鵝湖雜誌》的王財貴先生所發起的「讀經運動」在臺灣發展的情形，且說明此一運動的文化意義。王所長說廣州並無類似的讀經團體，不過也非常注重傳統文化的生根問題，所以曾編寫了一些融合傳統蒙書內容的普及性讀本，以傳播優良的傳統文化，這類書的銷售甚佳，可見廣州人對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視云云。孫中山研究所王副所長謂該所於一九八六年三月由歷史所分出而獨立成所，和臺灣學術交流的單位，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國父紀念館等，現有研究人員十二人，主要以孫中山的思想與實踐、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史、孫中山史料研究、二十世紀廣東史等為研

究重點。又與中國社會科學會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作，開發「孫中山訊息前沿研究」。在座談之際，中山大學李宗桂教授也來到現場。由於時間關係，於四點二十分結束座談，由章先生等人陪同參觀圖書館。

圖書館於一九五八年成立，現有面積一六七〇平方公尺，閱覽座位六十五個。中文藏書約十二萬種三十四萬冊，其中古籍九九九五種十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四冊、外文書籍三萬八千冊、報刊資料約三萬冊。收藏的條件較「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為佳，明亮整潔，分為三個部分，最高樓收藏「古籍」，其中如：嘉慶十一年(1806)譚經草堂刻的楊有慶《詩序闡真》八卷、晨風閣刻的江瀚《詩經四家異文考補》(編號：10531)，都是第一次看到。下一層樓收藏「近代書籍」，如香港昭明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的陳耀南《魏源研究》一書，雖曾見到他人引用，然此實第一次翻閱。再下一層則是「期刊室」，林老師就將本處的《集刊》與《通訊》贈送給該館，並希望與他們出版的《廣東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情報資料》等刊物，建立正式的交換關係。走馬看花般地參觀過圖書館後，即到樓下合影留念，李宗桂先生因晚上還有博士生的課要上，所以先行離開，其他人則留下共進晚餐，大約在八點二十分左右回到旅館休息，結束一天忙碌的參觀拜會活動。

七、陳氏書院

十二月二日(星期六)

早上八點鐘，戴偉華教授及其夫人陳秋琴女士，帶我們去用早餐，坐上王師傅駕駛的「粵 A33785」號車子，到達一處有山有水、佔地廣闊的餐廳，餐廳門口有幾位穿著紅色旗袍的年輕小姐，散發房屋銷售的廣告單，順手拿了幾張，好回臺灣後，提供給胡曉真的另一半、學建築的龔書章作參考。餐廳的位子雖然甚多，但還是座無虛席，最後只好與其他客人併桌用餐。偉華說廣州人對吃甚為看重，尤其飲早茶的風氣，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盛行，因此餐廳雖不少，然平常用餐，大多數是客人等座位，很少有座位空著等客人。不過我還是最喜歡廣州的「肉片粥」，大概是因為民國六十三年在大金門「南雄」當兵時，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和陳永山跑五千公尺後，再跑到「山外」菜市場內吃「廣東粥」(即肉片粥)的習慣，殘餘

到現在吧！

餐後於九點二十五分到達位於恩龍里中山七路的「陳氏書院」，俗稱「陳家祠」，亦即「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所在地。今廣州一號地下鐵「陳家祠站」，即在其入門左方十幾公尺處。前往陳氏書院的途中，看到一處人潮洶湧的地方，偉華說那是廣州最著名的「大型購物中心」（即臺灣所謂「大賣場」），由於購物者甚多，因此需要排隊纔能進入，甚至誇張到需要排一小時以上纔能進去。據說經營者是一位「臺商」，這位商家顯然投資方向正確，並且已搶得先機了，恭喜他。書院的大門前是一片青草如茵的綠地，購買人民幣十元的參觀券進入，大門後是一小塊長方形水泥地停車場，水泥地上有幾棵老樹，停車場前還有一塊綠地，大概時間還不是太晚，所以遊客不是很多，只有三輛車子，離開時則已人潮洶湧，車子一堆了。當初先搶時間在門口照相，然後纔進入屋內的參觀程序，顯然是做對了。

「陳氏書院」是廣東七十二縣陳姓宗親集資合建的族祠，籌備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光緒十六年(1890)始建，完成於光緒二十年(1894)，參與興建工程的商號和技術工人，根據建築物上的留名，至少包括有：瑞昌店、劉德昌、泰昌、許三友、文如璧、美玉成、均玉、寶玉、吳奇玉、黃南山、梁澄、楊鑑廷，梁進、黎璧竹、石泉、楊錦川等。建築物主要是作為族人供奉祖先與祭祀先祖的場所，同時也是提供族人參加科舉考試、讀書溫書的地方。一九〇五年廢科舉以後，到中共進入廣州以前的民國時期，又成為培養宗族和廣州地區人才的教育場所，先後辦過「陳氏實業學堂」、「廣東公學」、「廣東體育專科學校」、「文範學校」、「聚賢中學」。中共進入廣州後，於一九五〇年設「廣州市行政幹部學校」，一九五七年被列為廣州市重點保護文物，並進行整修。一九五九年闢為「廣東民間工藝館」，一九六二年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一九六四年扶正加固「頭門」及「聚賢堂梁架」，並翻修「灰塑」。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為工廠，被破壞得面目全非。一九八一年收回，中共中央撥款一百六十萬元進行大規模的整修，一九八三年春對外開放，一九八八年經中共國務院公布，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氏書院」的方位是坐北朝南，門前原有開闊的廣場。門內設有前、後、東、西等四院，有五個門，由東向西，依次是：「德表門」、「蔚穎門」、「正門」、「昌嫻門」、「慶基門」，整個建築的面積有一三二〇〇平方公尺。主體建築物的寬和縱深均為八〇公尺，呈一正方形。建築方式以中軸為主線，兩邊對襯，為「三進三路九堂兩廂房」的布局，外面有圍牆，形成一個六院八廊、大小十九間

建築物的獨立建築群體。正門前有一對「石獅子」、一對「石鼓」；門上彩繪兩個四公尺高的門神。大門上方有一橫匾，寫著「陳氏書院」四字。我們從正門進入，往右入第一進的「東廳」，當時有「嶺南古建築展」，比較特殊的是發現早期廣東一些房屋的大門，一共設有三道門，其中一道近似臺灣現在的鐵製大門，以粗大的木頭欄杆做成的大門——「趟櫳」，這是第二道門。據旁邊參觀的當地人說，廣州的治安一向不是很好，所以西關一帶的大戶人家，纔加設幾道門，以防不速之客，而「趟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道門，廣州西關的居家，平時很少將整個大門打開，這是清代以來的習慣²⁴。聽他一說，纔想到偉華要到廣州任教之前，好像也有人跟他提到廣州治安的問題，不過到現在為止，偉華對這個意見還持保留態度，因為廣州的治安，實際上並沒有像傳說那般的可怕，或許傳述者有點言過其實吧！另外展出的家庭用具，像臉盆、洗臉盆架、油燈、床、椅子等等，其實和我小時候使用和看到的並沒有多大差別，沒想到廣州也和臺灣一樣，許多三、四十年前的日常用具，現在已經變成稀有之物了。例如臺灣現在要找一個民國四、五十年代，每個家庭都有的陶製「筷子筒」和「油燈」，或晚上抓青蛙用的「電土燈」，恐怕相當困難，因為已經沒有人使用了。接著到最中心的中進大廳「聚賢堂」，也就是以前祭祖和議事的重地，不過所有和祭祖有關的神主牌位、供桌、祖先畫像等等，在文化大革命時，命都已經被革掉了，現在只剩一棟空的建築。新的擺設則是與祠堂毫不相關的一些民間工藝品，像「刺繡」、「剪紙」、「麥稈畫」、「菩提樹葉畫」、「人物塑像」、「雕刻」、「陶瓷器皿」、「泡茶用具」、「文房四寶」、「琺瑯製品」、「玻璃藝品」等等，我對「麥稈畫」和「菩提樹葉畫」比較有興趣，所以買了一些，尤其是十二生肖中的兩種不同形狀的馬，因為知道張以仁老師肖馬，喜歡馬型的物品，所以趕快買下來，準備送給張老師。當時正好遇上一群廣州當地的初中生來參觀，說是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的課程之一，這個設計倒不錯，對家鄉文化的認識，應該會有一點幫助。展覽的作品中有一個非常精緻的神轎，和臺灣的神轎差不多。另外有一個中看不中用、非常大的端溪硯臺，以及一些象牙的雕刻品、好幾層的球雕、橄欖子的雕刻、竹雕、要用放大鏡看的毫雕等等，由於興趣不大，所以沒有仔細看。

²⁴ 有關廣州大屋的門禁，參見曾應楓：《俗話廣州》（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8月），頁110-113所論。

我比較注意建築物本身，包括殿、堂、廳廊、門窗、欄杆、屋脊、樑柱、神龕、露臺、牆壁、基座等上面；原有的木雕、磚雕、石雕、交趾陶、壁畫等等。如進大門木隔牆上，雙面雕有「漁、樵、耕、讀」四圖，兩邊的木柱上刻有一幅陳瑞燾在光緒十九年(1893)撰並書的對聯：「道纘太邱星聚一堂昌後世」、「德鄰廣雅風培百粵振斯文」。其他還有各種神話、傳說、小說、歷史故事和象徵吉祥的雕畫。故事和神話有：「踐土之盟」、「曾子殺豬」、「桃園三結義」、「古城會」、「曹操贈錦袍」、「張松看孟德新書」、「孔明智收姜維」、「竹林七賢」、「劉伶醉酒」、「畫龍點睛」、「淵明採菊」、「公孫玩樂圖」、「風塵三俠」、「尉遲恭金殿爭帥印」、「梁山聚義」、「劉慶伏龍駒」、「劉海戲金蟾」等等。吉祥神話雕刻圖有：「王母祝壽」、「八仙賀壽」、「群仙祝壽」、「麒麟玉書」、「鳳凰牡丹」、「三羊啓泰」、「雙鳳朝陽」、「九師圖」、「福壽雙全」、「和合二仙」、「狀元及第」、「加官晉爵」、「獨占鰲頭」、「二甲傳臚」、「喜上眉頭」、「喜上枝頭」、「雙龍戲珠」、「鍾馗」、「百鳥圖」、「五倫全備」、「麻姑獻酒」、「瓜瓞連綿」、「麒麟送子」、「金玉滿堂」、「英雄圖」、「富貴福祿」、「歲歲有餘」、「年年有餘」等等。風景名勝有：「羊城八景」、「漁歌晚唱」等等。諧音吉祥水果與土產有：「鳳梨」、「楊桃」、「荔枝」、「木瓜」、「橘子」、「佛手柑」、「仙桃」等等。比較特別的是木雕的連環故事畫，如「聚賢堂」十二扇門上刻有從商、周到宋代的故事畫：「渭水訪賢」、「黃飛虎反五關」、「六國大封相」、「韓信點兵」、「郭子儀祝壽」、「李太白退番書」、「薛仁貴大戰蓋蘇文」、「岳飛大戰金兀朮」及「龍王八仙朝玉帝」、「夜宴桃李園」、「攜琴訪友」、「榮歸故里」等。「東廳」隔扇門上有《三國演義》的「三顧茅廬」、「三英戰呂布」、「赤壁之戰」、「趙雲救阿斗」等。「西廳」則有《水滸傳》故事的「血濺鴛鴦樓」、「拳打鎮關西」、「三打祝家莊」、「枯井救柴進」等。另外還刻有歷代詩文名句，如：李白(699-762)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牧(803-853)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陳獻章(1428-1500)的「青山依舊鎖溪臺，前度遊人去不回；賴是山人無訴牒，有人真本實山來」、湯顯祖(1550-1616)的「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王文治(1730-1802)的「雨過寒山解纜遲，將行還問後時期；鐘聲明發龍山下，猶望楓橋夜泊時」、翁方綱(1733-1818)的「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

嵩陽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等的詩句及范仲淹(989-1052)的〈岳陽樓記〉之文²⁵。不但雕工可觀，建築亦可看，可惜時間有限，無法仔細的品味。大約在十點五十分離開，如果有更多的時間，應該帶著望遠鏡（觀看屋脊上的交趾陶和詩文、圖畫）及好一點的相機，好好地紀錄，加以研究，應該可以有一番不同的發現。

十一點十二分抵達「廣州古籍書店」，開始選購個人需要的書籍，樓下有一些五折書，頗值得買，我買了兩本有關畫作與畫家生卒年的書：徐邦達的《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1996年10月)、陳履生的《二十世紀書畫名家年齡干支年號公元速查表》(1996年6月)，因為這類書除了可以知道一些不常見學者的生卒年和少見的名號外，也常常可以發現一些學者，有我們刻板印象外的另一種面貌。再到二樓選購，樓上與文史哲相關的書甚多，買到一部線裝的《集韻》，秋華想買線裝的《說文解字》，可惜沒有看到。由於我們購買的書較多，又經過偉華夫婦大力的交涉，書店勉強答應打九折優待，算賬的小姐使用收銀機不熟練而打錯價錢，結果幾個人的賬，算了一個多鐘頭，林老師開玩笑說，大陸十多年來進步甚多，廣州古籍書店完全沒有進步，即使有收銀機，卻和十多年前來的時候一樣，手忙腳亂的，也許是吃公家飯的關係吧！一直弄到十三點二十五分纔算好賬，但還是算錯了。偉華帶我們到一處湖邊的餐廳二樓用餐，視野非常好，可以看到遠處山林的青翠、湖面上陽光反射而成的粼光。收回視線，發現餐廳的窗簾都捲成燈籠的模樣，實在巧妙，臺灣如果有餐廳的服務人員學會這一招，肯定會造成轟動。餐後即到黃花崗憑弔革命烈士。

八、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下午三點二十五分抵達墓園凱旋門式的大門口，壯觀的牌樓上，刻著孫中山先

²⁵ 有關「陳家祠」之相關資料，可參見黎先耀主編：《中國博物館指南》，同注¹²，頁99-101；《廣州市文物志》，同注¹²，頁179-180；廣東民間工藝館編：《陳氏書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編：《陳氏書院》（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6年2月）；《廣州舊影》，同注⁷，頁71；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⁶，頁236-239；《俗話廣州》，同前注，頁125-128；《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簡介》（無出版資料）等文。

生民國十年五月六日所題「浩氣長存」四字，每位花了八元人民幣買票，進入大門後的墓道是鋪著石塊的寬廣道路，寬約三十公尺，由大門至墓地約二百三十公尺遠。王司傳說他小時候就住在這附近，文革時期此地並沒有受到破壞，所以現在的七十二烈士墓還是舊貌，不過有些地方則有擴充，所以整個墓園區較以前大了些。當我們進入還沒到達噴水池和石拱橋之前，旁邊的商店就有人拿著「八仙綵」，用臺語向我們推銷，店內居然還有一塊「愛拼才會贏」的橫匾，顯然來此地憑弔的臺灣人不少，否則商家就不至於如此了。

抬頭向上望去，方聲濤(1885-1934)題的「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後上方，自由女神依然高舉火炬，筆直著站在陽光下，棄愛情生命前途於不顧，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魂，默默地、無聲無息地長眠著。留存的是親人曾經無奈的悲痛？是獲得利益者隱藏的歡笑？是墓園後石碑上一行行已經斑駁的名字？是憑弔者一聲聲無言的喟嘆？九十年的時光過了，人們還記得什麼？是歷史？還是理想？面對著一塊塊堆疊成崇山形的「獻石堆」前，火光血肉交織的場景、慷慨激昂的陳詞、人頭落地的血腥、八指將軍(黃興，1864-1916)的故事、「伯先、伯先，你是民族的靈魂，歷史的榮光！」小學課堂上的吟誦，都活現在眼前，歷史的想像，如巨石般的壓在心頭，簌簌作響的樹木，永不停息的野風，似乎也都帶著悲悽了^②。受不了這種沉重的心頭壓力，趕緊離開，以免熱淚奪眶而出。

「黃花崗」原名「三望崗」，俗名「紅花崗」，一九一一年潘達微收斂七十二烈士遺骸葬於此，乃改為今名。民國元年始建墓園，民國十五年建成，民國二十六年擴建，一九五四年再擴建為「黃花園」，面積共有一三六〇〇〇平方公尺。墓園後約四公尺高的「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碑，以及墓園中的碑刻，如：「三月廿九花縣殉難烈士碑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喻大將軍墓表」、「大本營軍政部與廣東省長公署保護墓園佈告」、「補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烈士碑」、「陸軍上將鄧仲元墓表」(胡漢民撰、陳融書)、「黃花崗挽碑叢」(約有十個)等等，只要出現胡漢民、陳炯明(1878-1933)、鄒魯、汪精衛、蔣中正等的名字，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挖掉過(據說是文化大革命時幹的好事)，現在所見多是補刻的。墓園中有一棵林森(1868-1943)在民國九年二月種的榕樹、一棵民國

^②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籌款、遺書、失敗、砍頭、收屍等相關的照片，參見廣成出版社編：《大時代的故事》(臺北：廣成出版社，1981年10月)，頁70-75。

元年五月十五日孫中山先生親植的松樹，據說當時共種了四棵，僅存活這一棵。另外還有紀功坊（章太炎題字）、月臺（墓前的平臺）、石雕側門、紅屋、墨池、八角亭、黃花亭、黃花井、三公尺高的石雕龍柱等。另外還有潘達微墓、史堅如（1879-1900）墓、鄧仲元（1886-1922）墓園、喻培倫（1886-1911）衣冠冢、馮如（1883-1912）墓、王昌（1886-1918）墓、梁固一墓、楊仙逸（1891-1923）墓、越南人范鴻泰（1892-1924）墓等等²⁷。其中題胡漢民篆額的「補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烈士碑」，偉華懷疑是任中敏先生（1897-1991）代筆，因為任先生當時為胡漢民之秘書²⁸，再者鄧仲元墓園中鄧氏的銅像，感覺上好像站不住，如果沒有手中的劍支撐，似乎就會倒下去，看起來有一點滑稽²⁹。其旁有一大樹，樹下涼亭內，當時正有一群年老的男女聚在一起唱戲，歡笑聲響徹墓園，如此情景，未免令人覺得滑稽，不過這或許就是烈士們所追求的理想——自由、歡笑吧！走馬看花般的走過一趟，隨即前往華南師範大學。

九、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

前往「華南師範大學」的途中，由先烈東路轉廣東大道，經過「沙河頂」，看到路中間有一座高大壯觀的牌坊，上面題著「碧血丹心」四個大字，偉華說這是紀念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閥襲擊上海駐軍，衛戍淞滬的第十九路軍官兵與日寇血戰三十天犧牲的弟兄（全軍三萬人，陣亡一九五一員、傷七千餘員），在民國十九年委託楊錫宗所設計建造，民國二十二年完成的「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的入口大門，「碧血丹心」四個字是宋子文（1894-1971）所題，前面還有林森所題「十九路軍抗日陣亡將士故園」的門額，這是一座約十六公尺高，

²⁷ 潘達微、馮如、鄧仲元等人事蹟，可參見楊萬秀主編：《廣州名人傳》，同注³，頁 223-229；236-240；256-259 等處之文。

²⁸ 任中敏先生的生平與學術及擔任胡漢民秘書一事，參見陳文和、鄧杰編：《從二北到半塘-文史學家任中敏》（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3 月）一書所言。

²⁹ 「黃花崗」相關事蹟，可參見《廣州市文物志》，同注¹⁰，頁 145-146、148-154、163-164、249-252、312；《廣州舊影》，同注⁷，頁 79；余齊昭：《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同注⁸，頁 349-351；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⁶，頁 532-533 等處之敘述。

仿羅馬凱旋門式的花崗岩建築，墓園內有林森撰稿的〈第十九路軍陣亡將士紀念碑文〉及胡漢民的〈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公墓紀念碑文〉，敘述官兵在戰役中的英勇表現及其所具的意義。附近還有「抗日亭」與「先烈紀念館」^{③〇}。以前只知道「一二八」日寇把「涵芬樓」的藏書炸燬，國軍英勇抵抗，不知犧牲如此壯烈。王司傅說這裡在文革期間被破壞得較厲害，部分碑文被毀損，許多碑石被挖去當水溝蓋或鋪地板用。現在由大門到墓園的墓道，已經被切割為道路，非原來的模樣了。聽了王司傅的話，心中想著：面對這些爲了國家生存、爲了民族尊嚴、爲了保護平民百姓生命財產，因而犧牲奉獻一己生命的勇者，就這麼一座小小的墓園，這些人還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爲何不知加以保護，反而忍心的加以破壞？文革時期真的是中華民族的浩劫！然而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人不是人，只是動物一種」的世界呢？大陸會不會再次出現這種世界呢？誰能保證？日本侵略者在大陸所造成的滔天罪惡，難道真的只要一句「以德報怨」就完全解決了嗎？誰有資格代替所有無辜受害者說「以德報怨」呢？那些受到人民保護供養而無切身之痛的傢伙，又有什麼資格代表呢？這樣做豈非令人懷疑有「別人的孩子死不光」的心理？甚至是「藉著別人的痛苦，造就自己的聲名」之嫌嗎？又豈非鼓勵某些「人形低等動物」爲非作歹而不必負責任嗎？豈非在無意中加入了殘忍的「加害者」的一邊了嗎？佛教徒所以相信「輪迴」、「因果」，大概也是無法解決上述疑惑的一種解釋吧！車子順著墓園左邊的道路走，墓園的周圍種滿松樹，所以看不見園中的景象，車子雖然很快就離開「沙河頂」了，但是感傷的情緒與一連串的疑惑，則至今猶不能平息，似乎在精神上已把「十九路軍犧牲者」給帶回臺灣了。

十、華南師範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石牌，面積七十四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共有四十七萬平方公尺。前身是籌建於民國二十一年的廣東省立勤勤大學，當年八月改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爲勤勤大學師範學院，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改爲勤勤大學教育學院，二十七年八月爲廣東省立教育學院，二十八年九月改爲省立文理學院，

^{③〇} 「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諸事，參見《廣州市文物志》，同注^②，頁158-159；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⑥，頁535。

一九五〇年十月改稱為廣東省文理學院，一九五一年十月合併了中山大學師範學院、華南聯合大學教育系，正式成立華南師範學院，設有九系一科。一九五二年又併入嶺南大學教育系、廣西大學教育系、湖南大學地理系、南昌大學師範部、海南師專等院系。一九七〇年再併入廣州體育學院、暨南大學中文、歷史、數學、地理等四系。十月改名廣東師範學院，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恢復華南師範學院之舊名，一九八二年十月升格為「華南師範大學」，今有四個學院（文理、藝術、外語、體育）、二十一個系、四十四碩士班、十三個博士班、一個博士後研究。專任教師一〇〇一人、博士導師二十二人、碩士導師二八三人。研究生八三九人、大學生一一〇九一人、外籍生三十三人，歷屆畢業生超過十萬人。出版學術刊物十一種、一九九九年出版專著一二〇部、單篇論文一四六九篇。前十年共出版專著九七二部、論文七七九六篇，可見其學術潛能。另外為了加強研究發展的陣容，還特別注意到優秀師資的延攬，所以特地到揚州大學把戴偉華教授給挖角過來，這也可以看出該校領導對學術的用心、對學生受教權益的注重、對培養國家民族優良人才的努力，毋怪有如此輝煌的成果了。圖書館共藏有：中文書籍一六〇萬多冊、外文書籍二〇多萬冊、國內外期刊三千多種^③。可惜我們到達時已經下班，所以無法前往參觀。

五點鐘左右在偉華夫婦帶領下，進入座落在白雲山下、珠江河畔的校園。第一個感覺就是地大物新，到處是新的建築物、新的草坪、新生的樹木、新開的紫荊花等等。可能是距離市區較遠，感覺起來，空氣也似乎較為清新了。在乾淨的校區內，不少人在草坪上、操場上、馬路上，或走、或躺、或坐，好不熱鬧。偉華指著人工湖畔、隱藏在樹叢中的房屋說，那是暫居的宿舍，又指著東面正在建造的十幾層大樓說，那是以後的宿舍。學校旁邊是附設高中，偉華的女公子即在此就讀，非常方便，據說其女公子成績甚佳，在班上是數一數二的高材生，恭喜他們。偉華接著帶我們逛校園，首先到「師陶園」，這是為紀念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891-1946)而建，因此有一座陶行知先生的白色塑像，穿著長袍，戴著眼鏡，雙手後背，頭稍微偏向左邊，不知在觀看什麼？往西走是一大片草坪，草坪的北邊是一個人工湖，旁邊就是宿舍所在地，再往西是一個露天劇場，凹下的表演場地，正有一

^③ 「華南師範大學」諸事，參見《中國高校》，同注^⑧，頁540；「華南師範大學網站」：<http://www.scnu.edu.cn/> 相關之介紹。

些孩子在玩滑板車，四周則是高高的座位。再往西是一座花園，花園的南方有一孔子、子路、顏回等三人的全身塑像，孔子居中，子路背箭在左，捧琴的顏回居右，都是純白色的，剛好有一對學生要照相，所以就互相幫忙照團體照。然後回學校的員工餐廳——紫荊廳，餐廳在湖邊，帶著一點涼意的晚風，徐徐吹來，湖面上開始出現反射的燈光，偉華帶來該校中文系編輯，學術水準頗高，在海外具有相當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東方文化》，我們趁機要求補足本處所缺者，偉華答應幫忙。六點鐘左右與副校長王國健教授、人文學院柯漢琳院長、陳少華副院長、中文系謝飄雲主任及偉華賢伉儷共進晚餐，餐中提及雙方出版品的交換、臺灣出版品的提供、華南師大與暨南大學有關文哲方面研究的特色等等，餐後即回到旅館。回程經過一處路邊的牌樓，偉華說那是原來中山大學的大門，是民國二十三年委請楊錫宗設計建造的，五間十二柱的石牌坊，現在位於五山科技開發區的華南理工大學校門外，大約二百公尺處³²，因時間關係，故無法前往觀看。大約八點三十分乘坐王司傅的車回到旅館。

十一、夜論廣州學事

偉華回去後不久，子雄先生和陳澤泓先生、吳巧利小姐，攜帶「砂糖橘」來訪，怕我們太久沒吃水果不習慣也。「砂糖橘」像小一號的陽明山「海螺橘」，每顆直徑大約四到五公分，甜度確比「海螺橘」高，名實可謂相符。另外也帶來《二十七松堂集》的「勘誤表」、「中山圖書館」簡介資料、《廣東史志》、《羊城古今》及陳澤泓先生的著作——《嶺南建築志》、《廣東歷史名人傳略》等，我們很佩服陳先生著作出版之多，陳先生謙虛地表示，他大概每年出一本到數本書，對他而言，讀書寫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出版乃水到渠成之事，不會因此而有壓力。子雄先生並提到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屠友祥先生校注的《二十七松堂集》，補入的文章與附錄，其實是根據本處的版本，卻一字未提，並宣稱參校過其他的版本。證據是：書中訛誤之處，完全相同。如：〈四書私談十八則〉「達巷黨人章」一段，小字「予欲挽天河之水以洗之」一句，漏一「以」字（本處版，第3冊，頁29；遠東版，頁401）；〈答客問五則〉「客問：宋欽宗北狩」一段，

³² 參見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⁶，頁349所論。

最後一句「彼秦檜者又何足道哉」，漏一「者」字（本處版，第3冊，頁40；遠東版，頁410）；〈三藩謀逆始末〉「平南尙王之謀主某者也」，訛作「平南尙之王謀主某者也」（本處版，第3冊，頁66；遠東版，頁433）等，屠先生的校注本和本處版的錯誤完全相同³³。這種參考抄錄他人著作而完全不提的行為，不知大陸學界的看法如何？以臺灣學界的角度觀之，似有欺騙讀者與剽竊之嫌。兩岸在學術標準的要求上，應該是一致的，將參考資料列出，毋寧是正常與必要的學術要求，何必避諱？這樣一字不提，未免讓人可以合理的懷疑其動機之純正性？屠先生以為如何？我們期待大陸學界慎重看待這一類的問題，希望不要讓這種不是很好的行為變成常態。

林老師趁機請教他們有關湛甘泉墓、學海堂、長興學舍、萬木草堂等遺跡是否存在諸事。根據三位先生的瞭解，大略的情形是：湛甘泉故居已完全不存，其墳墓本來有好幾處，不能確定那一個為真，後來其中一個被盜，盜墓賊被捉，從出土的文物及死者遺骨年齡的科學判斷等因素加以考察，確定此一被盜挖之墓，纔是真正的湛甘泉之墓，其他都是掩人耳目的疑塚。「學海堂」的遺址完全不見。「萬木草堂」已經變成民居，原來的規模已被破壞。「長興學舍」猶存，不過掛的卻是「萬木草堂」的招牌。大約交談到十一點多結束。

十二、湛甘泉遺跡

十二月三日（星期日）

李宗桂先生早上八點鐘來訪，帶來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錦全先生託他轉贈我們的《李錦全自選集》（2000年10月）及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舉

³³ 這種從訛誤完全相同，以觀察兩者之間傳抄的情形，在作經學史發展、傳播、影響研究時非常有用，從實證的觀點言，這是一項相當強而有力的證據。這要感謝筆者的老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的周虎林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的劉文起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的張以仁教授、吳宏一教授；以及學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鴻森研究員等，在筆者撰寫博士論文《明代詩經學研究》時，一再的提醒教誨，現在提供出來給有興趣的人做參考。

辦的「紀念湛若水誕生五二五週年學術思想研討會」的論文集——《湛甘泉研究文集》^④，這本書在臺灣比較少見，所以商請戴偉華教授幫忙，再尋找幾本。接著由陳勝先生開著「粵 KS0252」的車子，帶我們到「迎賓館」用早餐，據說餐廳是以前的「總統府」，大門前還擺著一輛一九九四年林肯牌加長型的禮賓車，是租給別人喜慶或迎接重要客人之用，據說生意很好，經常出勤。餐廳的設備不錯，假山流水，池邊的椅子上，坐了不少人，好像在觀賞池中的游魚。餐廳內人潮洶湧，大約等了半個鐘頭纔有座位，原來池邊椅子上的人，不是在觀賞風景，而是在等位子，可見其生意之興隆。餐後即驅車前往廣州東南邊四十三公里遠路程的增城縣「新塘鎮」，尋訪湛甘泉（若水，1466-1560）的遺跡。

增城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東北角，西距廣州的路程有六十六公里，建造的歷史，已有一七九二年之久，水路交通便利，曾有「黃金走廊」、「東江河畔一顆璀璨的明珠」之稱，也是著名的水果之鄉，尤其「掛綠荔枝」最負盛名，「何仙姑廟」是最熱門的旅遊勝地，「裕達隆花園」中的南北珍稀古樹花草：千年羅漢松、百年茶樹、衆多蘭花，根雕、奇石、動植物化石等等，最具特色。當然這些都不是我們探

④ 此書在臺灣比較不容易見到，謹將書內文章之篇名、作者錄出，提供學者參考。關步勛、黃炳炎、陳裕榮、丁楓等主編：《湛甘泉研究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7月）收錄有：何國華：〈紀念湛若水先生誕生525週年學術思想研討會綜述〉；李錦全先生：〈湛甘泉哲學思想述評〉；陳裕榮、伍深明：〈清新脫俗哲人師——甘泉學術思想初探〉；辛朝毅：〈湛甘泉哲學思想淺論〉；羅邦柱：〈辨儒釋之異同，繼白沙之絕學——甘泉遵道管窺〉；黃明同：〈嶺南文化奇葩——甘泉「主一」哲學〉；羅佐才：〈湛甘泉心學思想初探〉；陳憲猷：〈湛甘泉心學特點探疑〉；馮達文：〈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說的哲學含蘊〉；梁雋華：〈「心性圖說」與湛甘泉的心性論〉；陳占標：〈湛若水師承白沙學說略論〉；何國華：〈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和實踐〉；高美玲：〈湛若水論治學方法〉；蔣祖緣、凌峰：〈湛若水的政治思想與教育思想〉；關履權：〈湛若水的政治思想及其時代〉；李龍潛：〈試評湛若水的社會經濟思想〉；覃召文：〈論湛若水的文藝思想〉；管林：〈湛甘泉與王陽明之友誼〉；李育中：〈從陳白沙到湛甘泉——提出一個「陳湛學派」問題〉；羅志歡：〈「湛家園」考略〉；全洪：〈明湛若水墓及其隨葬器物〉；黃森章：〈湛若水墓之謎〉；宇松：〈新塘·懷枝·湛若水〉；陳裕榮：〈湛甘泉年譜〉與〈湛甘泉有關史料簡介〉附〈湛甘泉與陳白沙交往的有關文章、書信、詩歌選錄〉；羅志歡：〈湛若水著述及其研究資料總索引（初編）〉等二十六篇文章及李俊權、余煥堯、張難生、林永年、陳煒英、鄧光禮等官員之致詞。附關步勛〈編後記〉及出席此次學術研討會學者的名單，全書共276頁。書前還有多張彩色照片，其中「湛甘泉墓」與「湛公祠」現在的實景，已被破壞，大非相片中的原貌，可見保護單位實未盡責。

訪的重點。

進入新塘鎮，最新鮮的事，是看到不少穿著黃色條幅制服的機車騎士，一群群地聚在路邊，後來一問纔知是載客的，作用與計程車一樣。首先我們到達「增城市新塘鎮政府」，建在路旁階梯上凱旋門式的牌坊大門，是我們所見大陸最壯觀的政府辦公室大門，最後我們在鎮政府旁的「增城市公安局新塘分局」的辦公大樓，找到吳月堂先生願意幫忙。吳先生告訴我們新塘鎮姓吳和姓湛的最多，湛甘泉的後代還有留在新塘鎮的，他帶著我們經過狹小的街道，在十一點左右抵達現在的「菊泉中學」，所以稱作「菊泉」，主要是為了紀念湛甘泉與崔菊之兩位對教育奉獻的功績。據湛甘泉的後裔湛菊文先生說，此校原稱「新塘中學」，也就是原來湛甘泉的住處——「尚書府」，後來改作湛甘泉家祠的「湛公祠」，他們稱湛甘泉為「歪口公」，也稱「三部尚書」，這裡現在屬於新塘鎮新河大隊朝市生產社。吳先生解釋說，文革以前稱「公社」，文革時改稱「革命大隊」，現在則稱「鎮」。學校大門上九二年六月開會時，還有「湛公祠」的橫額，後來重新裝修改建時被破壞，現在只有「菊泉中學」四字。吳先生說他小時候「湛公祠」還在，整個祠堂大約有一百多公尺長，還指出湛甘泉塑像的位子，並說塑像的嘴巴的確是歪一邊，在文革時，整個祠堂被拆毀，塑像也被打壞了，現在只剩下升旗臺後面兩間破屋的牆壁，是當時祠堂遺留的建築，現在的產權是屬於一位華僑的。我們遇到一位在該校任教的語文教師張紅慧小姐，她非常熱心地聯絡年長的退休教師，希望能告知我們一些相關的訊息，可惜大家所知不多，提供的訊息有限，還是非常感謝她的幫忙。後來經過我們在校園仔細的搜尋，發現在入門大約二十公尺處，種有一些花的臺階內，還殘留有兩個柱礎，學校門口的水泥廣場邊也有兩個被挖出來的柱礎，這四個柱礎，大約是「湛公祠」唯一存世之物吧！本來還聯絡上一位退休的鎮長，據說他對「湛公祠」破壞拆毀，以及湛甘泉相關的事蹟，知道得較多，不過這位鎮長因為曾經遭受某些迫害，聽說有臺灣來的人要訪問，非常緊張，拒絕接受訪問，所以只好作罷。

吳先生接著帶我們到還在興建的「新塘公園」，於十一點五十三分到達。吳先生主要是讓我們參觀公園內由滕衛城設計製作，完成於二〇〇〇年一月的「大型歷史人物浮雕牆」，上面浮雕有「新塘古地貌」、「人杰地靈」外，還浮雕了陳大震(1225-1307 之間)、葉野舟(1225-1307 之間)、陳瑞貞(1333-1424 之間)、陳政(1416-1475)、湛若水、伍閻(1522-1566 前後)、盧崇勛(1588 年舉人)、

陳堂(1522-1620 之間)、徐勤(1513-1617)、陳經翰(明代人)、湛躍之(1612-1621 前後)、陳恭尹(1631-1700)、鍾文英(1666-1711)、湛夢蛟(1760 年前後)、姚玉麟(1748-?)、湛菊生(1802-1876)、陳晃(1821-1908 之間)、黃國民(1874-1935)、伍來成(1899-1943)等十九位神態個個不同的先賢人像。據其二〇〇〇年元月十日的「前言」說：新塘古稱「沙貝」，新塘之名首先出現在屈大均的文章，所謂「新塘多美種荔枝」。新塘自古人才輩出，以科舉論，南宋至清代中進士者十人，明、清兩代中舉人者八十八人，浮雕的十九位，則是各類人才中，比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其繼往開來、弘揚我中華優良文化之成就，足以勉勵後輩，作為學習典範，故選為浮雕之對象。各個浮雕像前均有該位人物生平事蹟之介紹，此種在公共場合表揚說明鄉土在歷史上有貢獻人物之方式，於愛鄉愛家之教育，應有正面的作用，值得肯定。另外在入門處有一混凝土捏製的大型「赤壁游舫」的雕塑品，這是根據增城市博物館收藏的清代湛菊生在五十三歲時，用橄欖核雕刻而成的作品，放大十三萬倍而成。作品中的人物有蘇東坡(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佛印(了緣，1032-1098)、搖船女、幼童、書童等六人，六人的神態各異，船身不但有門窗，還可以開合，更刻有不同的圖案。這也是滕衛城在二〇〇〇年一月完成的作品。

接著吳先生帶我們去尋訪湛甘泉的墓，吳先生所說與子雄先生等三人所說相同，謂湛若水因為當官之際，得罪不少人，因此害怕死後墳墓不保，所以做了好幾座的疑塚，至少在新塘東埔、永和天蠶山、鎮龍大涵和九樓等地，就發現了六座。一九八四年增城縣政府，因為無法確定哪一個為真，故將六個都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不過最後還是逃不過盜墓者的毒手，一九八九年六月天蠶山的墳墓被人用炸藥炸開，盜墓者從中偷出二十餘件陶俑、陶罐等文物，從墓的規模、型制、文物與遺骨，確定此為湛甘泉真墓，四百多年來的疑惑因而獲得解答。由於直接到永和天蠶山的道路正在修補，無法通行，吳先生帶著我們繞道沙埔鎮，經由龍源水泥廠的小路，經過永和鎮鍾陂頭村、鍾陂頭小學、永恆凌村、九如小學等，到達「永和敬老院」前。由於無法確知墓地，吳先生就到對面的「永和石油供應處」問路，結果她們也不知道，問了許多人也都不知道。正在無法可想時，吳先生看到一輛由西往東走的機車，就招手把他攔截下來。無巧不巧的，此位機車騎士——鍾偉權先生，他以前經營的荔枝園，正好在天蠶山湛墓的旁邊。好像是上天特別安排他來帶路，否則還真是無法找到呢！鍾先生帶著我們往東回走，不到二百公尺處，靠左邊一片雜

草叢生的野地，有一條泥土小路，路上還有兩、三堆垃圾。路太小，車子無法走，所以大家下車步行，大約五十公尺處有一戶農家，農家的周圍都是荔枝園。再往農家後面走約三十公尺處的荔枝園內，出現幾根斷成好幾節的石柱，鍾先生說以前這裏還有石馬、石人、石羊、石獅、石碑坊，這幾根斷柱應該是石碑坊的殘餘，當是墓道的一部分，可惜整個墓道都被破壞得毫無蹤跡了，再往上走約二十公尺，於一點十分看到一堆長滿一人多高蘆葦草和小樹的小丘，鍾先生舉手指著那堆雜草、雜樹叢生的亂草堆說：「這就是湛甘泉的墓。」走近一點仔細瞧，纔發現在蘆葦雜草掩蓋的牆壁上，嵌有一塊方形白石版，若隱若現的似乎有字，撥開野草纔看到上面寫著：「增城縣文物保護單位」、「湛若水墓」（大字）、「增城縣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八月」等四行字。在野草掩蓋下的墳墓，隱約看到有三層，每一層的高低大約相差一公尺，由於野草叢生，所以非常難走，到達墓碑前面的那層，發現離墓碑半公尺左右有一條深溝，鍾先生說，那就是盜墓者炸開的地方，以前他還進去過，裏面黑漆漆的，什麼也沒有。深溝後面漢白玉石的墓碑上刻著三行字：「明贈太子太保諡文簡南京禮吏兵部尚書湛公諱若水之墓」、「新塘旅港湛氏宗親會立」、「公元一九九一年辛未歲冬月吉日重修」，鍾先生說以前的墓碑已被盜墓者炸碎了³⁵。後來李宗桂先生給了鍾先生十元人民幣，原來鍾先生也是機車載客者。由於蘆葦草與其他雜草樹木叢生糾結，因此無法細觀，所以很快就離開了。從現場一、二公尺高的蘆葦和雜草叢生的情形判斷，顯然從一九九一年立碑以後，再也沒有人加以維護整理，因此任由野草雜樹橫生了，官樣文章無補於事實，此又可得一確證也。大約在一點四十分回到新塘鎮上的「兄弟漁港餐廳」用餐，餐廳的規模非常大，房間甚多，餐點也非常豐富，其中有一道「木瓜鮑魚」，據說每一份就要人民幣二百元，李先生堅持付費，這一餐恐怕至少要花掉他一個月薪水的四分之一了！餐後送吳先生回其辦公室，隨即離開新塘鎮。

³⁵ 湛甘泉墳墓及被盜諸事，參見全洪：〈明湛若水墓及其隨葬器物〉與黃森章：〈湛若水墓之謎〉，收入關步助等編：《湛甘泉研究文集》，同前注，頁 220-229；陳澤泓：《廣東歷史名人傳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138-149；《嶺南建築志》，同注⁶，頁 521-522 所言。

十三、長興學舍遺跡

四點二十分回到廣州古籍書店，與子雄先生、倪主任會面，以便前往拜會王貴忱先生。因為昨天的賬算錯了，所以約在此地見面，再重新算一次賬，真是沒辦法。算好賬，子雄先生隨即帶我們前往「長興學舍」。

「長興學舍」是康有為在光緒十七年(1891)講學的「學堂」，著名的學生除陳千秋(1869-1895)、梁啟超外，還有徐勤(1873-1945)、麥孟華(1875-1915)等二十多人，康有為自任總教授兼總監督，並撰《長興學記》為學規，又在此刊刻《新學偽經考》。蓋康氏於光緒十四年(1888)上書皇帝，引發政治風暴，於十二月回到廣東，隨即遷居至廣州曾祖父所購，位於惠愛街的「雲衢書屋」。他已經意識到教育是培養人才、宣傳思想的最佳工具，因此開始辦學堂講學。光緒十六年陳千秋、梁啟超到此求學，十七年即移往「長興學舍」，光緒十八年「學堂」移至衛邊街「鄭氏祠」，光緒十九年冬又遷往「府學宮仰高祠」，並正式掛匾稱「萬木草堂」。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堂名即寓有培植萬木為國家棟樑之意。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學堂被清廷查封為止，培養的學生約有上千人，其後風起雲湧的講學、辦學堂、出刊物等等熱潮的出現，多多少少與這些學生相關，康氏對近代文化傳播影響之大，由此可見，然相關的深入研究，似猶未見其人³⁶。

「長興學舍」位於中山四路邊的長興里三號，正如前日子雄先生他們所說，右邊門口，掛著一塊已經有點剝落泛黃的漢白玉石版，由上往下刻著三行字：「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萬木草堂」（大字）、「廣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公佈」，抬頭往上面看，就在雜亂的粗電線後面，由右至左浮刻著「邱氏書室」四字。往門內望去，昏黑的房子內，雜亂地堆放著一些東西，不規則的擺著幾臺布滿油污的機械，請教屋內看守的老人，纔知此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成為一家「鑰匙工廠」之工地，很不可思議吧？根據老人的瞭解，現在這間房子經過幾次整修，大概只有幾根橫樑是原屋的遺物，其他皆是後來整修時所加之物。不

³⁶ 康有為事蹟，參見陳澤泓：《廣東歷史名人傳略》，同前注，頁498-514。

過他說老闆特別交代，不准在此地照相，因為看我們老遠來，纔讓我們在門口照相，屋內則絕對禁止照相，所以無法為那幾根橫樑照相存證，說不定下一次來，連那幾根橫樑也不見了呢！屋子的旁邊是一條小巷，據說都是邱逢甲的後裔。我們問了幾位有關「長興學舍」之事，他們只知道這是當時邱氏宗親辦的學堂，其他已經沒有人知道了。小巷的旁邊是「大塘街文德居民委員會」，據說是居民自治、調解爭端之處。離開「長興學舍」後，即直奔文明路王貴忱先生的寓所。

十四、文獻學家王貴忱先生

王貴忱先生，民國十七年(1928)出生於遼寧省鐵嶺縣(今屬鐵嶺市管轄，在瀋陽市東北方七十六公里)，少孤無法上學，學識都來自一己的勤修苦學；十六歲(1945)加入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歲(1949)隨軍南下廣州，二十四歲(1952)擔任交通銀行粵東支行經理，一九五七年在政治上遭遇坎坷，被打為「右派分子」，歷經二十幾年的「右派」生活。自一九七九年以後，曾先後擔任過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廣東省博物館的領導職務、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今已退休。公子王大文先生是助理研究員。

王先生收藏的因緣是：一九五三年在偶然的機緣下，於天津一家書店巧遇周叔弢先生(1891-1984)，從此開始了他從未間斷的節衣縮食的收藏和研究、著述的生涯，即使遭受政治變故時，也無法動搖其致力學術的決心。按照周先生的指點，王先生將收藏的重點放在明、清以後的刻本、手稿等方面，在收藏的過程中，除周先生外，還得到魏建功(1901-1980)、潘景鄭(1907-)、于省吾(1896-1984)、容庚、戴葆庭等前輩學者的支持與幫助，交遊者還有李一氓(1903-1992)、李可染(1907-1989)、葉聖陶(1894-1988)、顧頡剛、喬承祚、張政烺(1912-)、胡厚宣、李學勤、蕭艾、周一良等先生，其往來書信，王先生皆裝裱珍藏，今亦成為珍貴之文獻矣。總括王先生收藏的內容，包括古籍、錢幣、金石、書畫、信函等，所藏南宋版殘本《詩經附音注》、元刊虞集(1272-1348)《道園學古錄》、元寫本《寶元天人祥異書》等，以及明本二百餘種。清初刻的錢謙益(1582-1664)、呂留良(1629-1683)、屈大均、金堡及部分乾隆時代的其他禁書，另外龔自珍(1791-1841)自校自刻的樣本《龔定盦詩文集》等，為稀見之本。不定期藏有清代名家的收藏本、名家校本、活字本、初印本、藍印本、紅印本等等，大多是罕見的

珍本。收藏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鉅的，有時爲了一本書，必須花費幾十年的功夫，例如清代王鏊(1776-1833)的《錢幣芻言》一書，自一九五三年起開始尋求，直到一九九八年纔獲得，又如王先生看上幾本具有版本價值的光緒年間刻的小書，最後以一幅唐雲(字俠塵，杭州人，1910-1993)的名畫^⑳，加上幾千元人民幣成交。王先生收藏書籍文物的目的，並不是要自我欣賞或當古董，而是作爲參考研究之用。因此他曾多次無私的將收藏品，作爲研究資料，捐贈給公家收藏單位^㉑，尤其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中國錢幣博物館，受惠爲大。

王先生的藏書處稱「可居室」、「古泉齋」。藏印有：「貴忱所藏」、「可居室」、「貴」、「鐵嶺王氏可居室所藏古貨幣記」、「此真奇貨可居也」、「有錢人家」、「行伍出身」、「真個鐵嶺人」、「學劍不成學畫蛇」、「生長遼東地，來作嶺南人」、「嶺海大學肄業」、「貴忱寓目」、「貴忱珍賞」、「鐵嶺人」、「曾見豬走」等。王先生苦學有成，學問精博，精於文獻、版本、目錄之學，又治泉幣、金石等，編輯、撰著的書籍至少有：《可居室題跋》、《可居室所藏錢幣書目》、《先秦貨幣文編》、《中國錢幣大詞典·泉人著述篇》、《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張蔭桓戊戌日記手稿》、《潘景鄭先生書簡先生》、《李一氓同志書簡》、十五巨冊的《中國錢幣文獻叢書》、八大冊的《屈大均全集》等等^㉒。而單篇論文不與焉。尤其龔自珍《文集》的版本收集最齊全，曾在《廣州師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九八七年第一期與第二期、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與第三期、一九九八年第五期；《學術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發表過一系列有關龔自珍《文集》不同版本的內容大要及其評價等，可見王先生研究著述之專心與勤奮。

四點四十分到達王先生的寓所，林老師將帶來的《魯實先生珍藏手札》贈予

^⑳ 唐雲生卒年，見陳履生編：《二十世紀書畫名家年齡干支年號公元速查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6月），頁122。

^㉑ 王先生不僅將資料捐贈給公家單位，也常將資料贈給需要的後學，如辛德勇即其中一例。見辛德勇：《未亥齋讀書記·書林剩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頁3-5。

^㉒ 王貴忱先生事蹟，可參見鄭偉章：《文獻家通考·王貴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下冊，頁1711-1712；艾俊川：〈心願在新世紀前實現〉，《金融時報》1999年12月31日〈金融文化周刊〉之報導。

王先生，王先生回贈《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兩種不同裝池的《張蔭桓戊戌日記手稿》。王先生早已經把他珍藏的名人信函，擺在桌上，除前述交遊的諸學者外，還有近、當、現代等不少學者、文人、政治人物，如：羅振玉、張爾田、李木齋、孫中山……等等，另外還有乾嘉人物，如孫星衍、阮元、凌廷堪……等等之信函，王先生說還有一些嘉慶以前學者的信函，例如：錢大昕(1728-1804)、翁方綱等人，加起來有近百封。林老師聽了非常心動，希望王先生能提供出來，並加以釋文出版，相信可以造福學界不小。王先生因為看我們帶去的書，印刷品質甚佳，因此很爽快的答應了，細節則可以再談，希望此事很快就可以實現。王先生接著帶我們進入他的書房和臥室，拿出珍藏的書，包括：稿本李宗灝《謗書逆案》一卷、黃佛頤(慈博，1886-1946)《禁書總目》等，好讓我們開開眼界。王先生又說還有幾種「禁書稿本」，可惜不在此地，無法給我們觀賞。子雄先生和倪主任有點吃醋的說：怎麼認識王先生這樣久，從來沒有聽他提過這些書？我們則希望王先生能把這些稀有的珍貴文獻，儘快地出版，以嘉惠學界。我們更感謝王先生對我們的信任，願意毫不避諱地將他收藏多年而未公開的珍品，拿出來讓我們有機會大開眼界。一直觀賞到六點十分纔離開，一起到德政中路的「廣州大東南潮州酒家」用晚餐，由我們作東，王夫人非常客氣，所以留在家中沒有來。餐後於八點十分回到旅館休息，收拾準備明日離開的行李。

十五、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十二月四日(星期一)

今天預定的行程是參觀旅館旁邊，位於解放北路八六七號的「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開館的時間是早上九點整，我們稍微早到了幾分鐘，就在類似臺灣臺北市早期公車售票亭的購票處等候。九點整看到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穿著灰色衣服，顯得有點臃腫，身材微胖的中年婦人，一手提著熱水瓶，一手拿著已經泡著茶葉的保溫杯，面無表情的從東方走過來。接著拿出一串鑰匙，打開購票亭的小門，拿出拖把，將小門口的積水吸乾，再將拖把斜靠在旁邊暗紅色的牆壁上，然後關上小門，開始她的工作。門票價每位人民幣十二元整，購票後即爬上三層總共三十階的階梯，進入館內參觀。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是結合考古原址、出土文物展覽、文物展覽廳等多用途的博物館，博物館內出土的是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南越國第二代王——文帝趙昧的墓藏與陪葬的文物。一九八〇年底廣東省政府選定了廣州市區北邊，海拔不到五十公尺的「象崗」山丘上，準備興建四層樓高的宿舍樓群，因此進行整地工作，至一九八三年已把山頂削低了十七公尺，整出一片面積約五千平方公尺的平地，接著開挖地基。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北面第一幢樓動工開挖地基，工作人員發現地面有一些排列整齊的方形石版，從石版的裂縫往下窺視，似乎是一座地下建築，於是向工地負責人鄧欽友報告，鄧氏隨即呈報給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並立即停止施工。經過三天的勘查，派人進入裡面查看。從陪葬品與墓壁的圖案，確認是一座有地位者的古墓後，即向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國家文物局等相關考古單位報告，在七月一日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省博物館、廣州圖書館、廣州博物館、廣州市文化局等單位的人員，組成「廣州象崗漢墓發掘隊」，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始挖掘工作，至十月六日結束。為了保護墓地的完整與保存出土文物，廣州市政府於是在周圍畫出一萬四千平方公尺的面積，並委請莫伯治先生根據一九六四年〈威尼斯憲章〉（〈保護文物建築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之精神，設計建造了分兩期完成的博物館。第一期工程始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八八年二月完成，主要的工作是：加固與維修墳墓本身，在墓地上方建造一座防護棚。又在象崗東邊蓋一座展覽出土文物珍品的三層綜合陳列樓，以及連接古墓與綜合陳列樓，寬二·五公尺、長二百四十公尺的「迴廊」。接著進行第二期工程，一九九三年初在古墓北方，完成一座二層的主體陳列樓。墓地上方的防護棚，利用鋼樑、鋁合金和單面反光玻璃等建材，仿照漢武帝（156B.C.-87B.C.）「茂陵」的封土堆形狀，設計成「復斗形」。原墓地的建材主要是來自番禺蓮花山的暗紅色砂岩，所以博物館建築物的正面，用了一千三百多塊紅砂岩石，堆砌成一座寬三十五公尺、高十二·四公尺的石牆，石牆上有潘鶴設計雕刻的一對高達八公尺，頭頂日（男）月（女），赤手赤足踏握著大蛇的左男右女越人浮雕，分踞大門的兩邊，男女之旁還有幾隻老虎浮雕及戰艦文的浮雕，最下一層的兩邊，左右各蹲踞著一隻根據墓中圖像的模樣雕成的圓雕大石虎，一副躍躍欲試之態。這是整個博物館建築由內往外走的概況。

由外往內走，首先看到的是大門口的兩隻石虎，石虎的中間有一石階，石階盡頭的牆壁上，寫著「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經由左右臺階往上走，計三層共三十

個階梯，經大門進入大廳後，正面是四十六階筆直往上的階梯，階梯旁是一個彩色的整座博物館的平面圖，以及放置單張宣傳單之處，階梯後是售書處，右邊是挖掘實錄錄影帶播放處及紀念品銷售處。我們先觀看挖掘過程的錄影帶，這捲錄影帶沒有複製銷售，所以買不到，看完錄影帶後上階梯，經過「迴廊」，到達墓地原址，周圍草坪，綠意盎然，不像冬天景象。往下走過二十七道階梯，就到達深約三・二公尺的墓道入口，墳墓的形制好像一個南北走向的「甲」字，墓道就是「田」下的那個「丨」字，總共有七個房室。

首先是由南向北的「墓道」和「外藏槨」。「墓道」出土文物有：一組陶器（小鼎、鉢、罐、小盒、三足盒、匏壺、碗等）、小銅鏡、銅帶鉤、銅牌飾等。「墓道」往北至「墓門」前是「外藏槨」，出土文物有：大陶瓮（有「長樂宮器」戮印）、銅蓋弓帽、鐵釘、銅飾、銅鏃等。

「墓門」後是「前室」，長約三・一公尺、寬約一・八四公尺，「前室」象徵生前活動之「朝堂」，故在上方與四周的壁上，繪有一些紅、黑兩色模糊的雲紋圖案，出土文物有：鐵刮刀、環首刀、佩玉飾組（由玉璧、銅環、玉璜、玉環等組成，出土的玉佩飾組，大多已復原，可在「主體陳列樓」的五個展覽廳中見到）、銅杯、銅鏡、「景巷令」銅印、石硯、銅車馬零件與裝飾品（傘柄箍、冒、蓋弓帽、曲尺形輿飾、衡末飾等）等。

「前室」的右邊是「東耳室」，長約五・二四公尺、寬約一・七五公尺，是放置宴樂用具之所，出土了銅甬鐘、銅鈕鐘、石編磬、銅句鑼（有篆文「文帝九年樂府宮造」及「第一」至「第八」等字）、銅瑟柄、銅琴軫、銅燠爐（像現代用的有蓋子的小香爐）、銅壺、銅甌、銅鈞、銅提筒、銅鏡、銅戈（有銘文「王四年相邦义□□□……」「錫」等字）、銅帶鉤、銅蓋弓帽、銅棘輪、銅構件、青玉與水晶「六博」、博局棋盤構件（銅方框、鑲象牙支座）、鐵舌、鐵鑊、鐵鋤、鐵削、鐵圈、鐵掛勾、象牙配飾及陶製食具（罐、三足小罐、甌、匏壺、小盒、鉢、碗）、玉佩飾組、銀帶鉤及金銀飾片、魚骨珠等。

「前室」的左邊是「西耳室」，長約四・一三公尺、寬約一・七五公尺，當是置放日常生活用品之處，出土了大量的食具、用具、衣飾等，銅器有：壺、鼎、提筒、釜、烤爐、勺、薑礫（磨生薑泥的器具，與現代做「菜頭粿」即「蘿蔔糕」時，用來磨碎蘿蔔的器具一樣）、盆、匜、銅、臼杵、燠爐、鏡、虎節（有「王命=車徒」等字）、兵器（劍、鏃、箭桿）、鋸子、錐、印花凸版、算珠、鈴形器、

管形器、鉢形器、陽燧、軫、軫鑰、鐸、瑟柄、釦子、圓杯、車馬零件飾物（銜、蓋弓帽、傘柄箍、鑣、當盧、絡管飾、節約、纓座、帶扣、泡釘、環、轅飾、圓片飾）等。鐵器主要是鐵製的工具，包括：臼杵、錘、鎚、鑿、鏟、削、銼、鎌、錐、鐵、針、刮刨、刮刀、服刀、刻刀、彎刀、劈刀、鏟刀、環首刀、鎧甲、環等。陶器有：罐、鼎、雙耳罐、匏壺、甌、提筒、小盒、器蓋、漁網墜、扁響器等。玉器有：璧、璜、環、劍飾（首、格、琕、秘）、印章、舞人等。石器有：硯臺、研石、磨刀石、枕、斧、豬、印章（綠松石、瑪瑙、水晶）等。金器有：杯座足、帶鉤、器扣、釘子、管子等。銀器有：卮、銀錠等。玻璃器有：珠、璧、牌飾等。另有：鉛彈丸、鉛砂、五色藥石（保存的相當好）、藥材殘物、絲織品殘物、整隻象牙（據說是來自非洲）、象牙製品（雕刻、算籌、卮）、骨雕天鵝、墨丸、漆器殘物、封泥（「帝印」兩種、「昧」等）、竹籤牌（有墨書「金滕一□□」字）等近二百多種物品。

第二道墓門後，即放置墓主人棺槨所在的「主棺室」，長約四·八四公尺、寬約一·八四公尺，墓主穿著由二二九一片玉片組成的「絲縷玉衣」（已復原，擺在第一展廳），頭上有「頭箱」，雙腳下方有「足箱」。出土的物品，包括銅器：兵器（戈、弩機、鏃及鉛彈丸）、車飾、牌飾、帶鉤、漆木器附件（盆、釘形器、套環、環、鋪首、釘子、屏風等）、秘形器等。鐵器：兵器（劍、矛、戟、不知名兵器）、日常用具（鑷子、削、刻刀、鑿、鐵條）等。陶器：甌、璧等。玉石器：璧、璜、玉佩飾組（璧、璜、玉人、壺形玉、獸頭形玉、玉珠、玉套杯、玻璃珠、煤精珠、金珠等組成）、玉珮（獸首銜璧、金鉤玉龍、鳳紋牌形珮、龍鳳紋重環珮）、劍飾（首、琕、秘）、龍虎形帶鉤、鞞形飾、印璽（有篆書「泰子」、「趙昧」、「帝印」之字）、角形杯、蓋盒、蓋杯、承盤高足杯、觶、滑石耳杯等等。金銀器：印璽（篆書「文帝行璽」、「泰子」）、杏形金針、金羊、蒜瓣紋銀盒（據說是波斯的製品）、私官銀盒（有「一斤四兩右游私官□三升大半名甘百卅一一二三」、「私官□名甘一□卅兩□」等字）、銀帶鉤等。又有玻璃珠、玻璃貝、金花泡、牌飾等玻璃製品。其他還有象牙筒、龜卜甲、珍珠等。

「主棺室」右邊為「東側室」，長約六·九五公尺、寬約一·六一公尺，是殉葬夫人之處，出土物品包括銅器：印章（篆文「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夫人印」等）、提筒、釜、盆、匜、燻爐、帶鉤、牌飾、鏡子、鳳首飾件、蓋弓帽、環、鋪首、矛、鏃等。鐵器：削、刮刀、鑷子、釘子、冂形釘（像現代固定電線用的釘

子)等。陶器：瓮、罐、雙耳罐、鼎、盒、三足盒、壺、甌、盆、釜、甑、燠爐等。石玉器：組玉佩(璧、璜、環、珮、舞人、鱗、鞞形飾等組成)、龍形珮、舞人、璧、鞞形佩飾、綠松石印、無文玉印等。金器：篆文「右夫人璽」印、金泡、金片飾、金珠。銀器：帶鉤、匜、銀片飾等。玻璃器有牌飾與串珠；漆器殘物(博局、盒、案等)。象牙器：篆文「趙藍」印、棋子、篆文「衍」字封泥印、竹茱柄等。

「主棺室」左邊為「西側室」，空間與「東側室」差不多，也是殉葬者之所，出土物品有銅器：盆、匜(腹下刻有「蕃」、「容」、「二斗」等字)、勺、燠爐、鏡子、帶鉤、印章、鏃等；鐵器：鉞、削、魚鉤、殘鐵器等；陶器：瓮、罐、璧、燠爐、器蓋等；玉器：璧、璜、環、獸紋珮、組玉佩、鼻塞、印章、銅框玉卮等。另有金飾片、銀帶鉤、玻璃鼻塞、玻璃珠、漆器殘物(盤、盒等)、篆文「廚丞之印」和「泰官」象牙封泥印等。

「後藏室」在「主棺室」之後，長約二公尺、寬約一·八公尺，是儲藏廚房用品之處。出土物品，銅器有：鼎(有篆文「蕃禺少內」、「蕃禺少內容一斗大半」、「蕃禺少內容二斗二升」、「蕃少內一斗二升少半」、「蕃少一斤九兩少內」、「蕃容一斗一升」、「重廿八斤容六斗大半斗」、「蕃三斗」、「少內蕃一斗二升」、「重十六斤容三斗容大半斗」等等字)、薑礫、勺、鏊、釜、甑、煎爐、烤爐(像現代的烤肉架)、提筒、盃、異形壺、蒜頭瓶、鑑、盆、匜、銅、燈(有篆文「重十三斤十一兩」及「重十三斤十二兩」刻銘)、鐸(像現在道士作法時，手中拿的那個鈴鐺的放大，頂端刻一「王」字)等。鐵器有：鼎、三足架、叉、鉤、鏈條、鐵等。陶器有：瓮、罐、雙耳罐、甌、鼎、三足盒、器蓋、魚形響器等。另有銀洗(刻有篆文「三」、「六升畀左今三斤三兩乘輿」等字)、滑石爐、殘漆器、篆文「泰官」和「鄰鄉侯印」及「□□□印」之封泥等。

當然參觀的時候，這些東西早已搬離，只剩下一個空墓，轉了一圈後即回頭爬上平地，從右邊繞過墓地，上面有一些標示圖，記錄考古挖掘時的情況，也可以看到刻意留下的墳墓上層結構的剖面。往後走就看到三座金字塔形的玻璃棚子，這就是「主體陳列樓」，據說是仿造巴黎羅浮宮的廣場入口設計，我沒去過羅浮宮，故不知真假。前述出土物品的大部分，在此樓內的五個大廳，分二十一個單元展出。第一廳展出「主棺室」的九顆印璽、絲縷玉衣、組玉佩及玉璧等。樓下第二廳展出復原的屏風及一些玉器，大約也是「主棺室」之物。第三廳以「東、西側室」出土之物為主，以圖表標明十五位殉葬者的位置。第四廳展出日用品，包括兵器、符

節、藥物等，如：弩機、鐵甲、刻有「邦（張）义（儀）」名字的銅戈、青銅鏡、藍色玻璃、五色藥石、刻有銘文的虎節等。第五廳在樓上，展出的以「後藏室」、「東、西耳室」之物為主，如：大鼎、爐子、鐵叉、釜、釜、甗、煎爐、烤爐、提筒、盃，以及一些動物的遺骨殘骸、編鐘、編磬、琴、瑟等^④。由於時間關係，無法細看，只能走馬看花式地走一遭，所以印象不深。出來時經過販賣部，買了一個早期的對號鎖，然後再回到入門大廳，下大廳樓梯一半的地方是二樓，也有幾個展覽廳，其中有一個正在展出歷代的「陶瓷枕頭」，因怕耽誤時間，只好過門而不入。在大廳的書籍販賣部，看到了《增城縣志》、《從化縣志》、《廣州市志》、《廣州市文物志》、《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西諦書跋》、《廣州西關文化研討會文選——別有深情寄荔灣》及介紹博物館與南越歷史等等的書籍，機會難得，所以就為經學中心、圖書館與自己選了一些。接著選購紀念品，比較有興趣的是虎節、舞女等的小型複製品及廣東剪紙，買了一些回來送同人。因與李宗桂先生約好十點鐘以前見面，林先生於是先回旅館等候，我與秋華直到十點四十五分纔離開，離開時發現有一堆〈南越國歷史介紹〉的單張，就順手拿了十幾張回來，送給本處沒有去過廣州的人。回旅館的路上，半途碰到李先生，他因為擔心我們人地生疏被欺侮，所以特地趕過來看看，真謝謝他！

十六、賦 歸

十點五十五分離開旅館，由李宗桂先生帶來的車子，送我們到「芳村區」，「芳村區」是新開發地區，係以種植和銷售花卉為主的專業區，李先生的一位學生王建新先生，在此擔任「廣州花卉博覽園」的副總，所以李先生希望我們參觀一下該地的花卉市場，以廣見聞。於十一點三十分方到該地，怕趕不上飛機，乃直接到

^④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諸事，參見呂烈丹：《南越王墓與南越王國》（廣州：廣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張榮芳、黃焱章：《南越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編：《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7年1月）；陳澤泓：《嶺南建築志》，同注^⑥，頁500-502；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宣教部編：〈南越國歷史介紹〉，《南越王副刊》（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等相關之資料。

飯店「金城酒家」用餐。席中王副總和同來的「芳村區委員會常委」林中堅先生，提及廣州花卉市場的主力，主要來自臺灣，甚至整個大陸花卉的批發市場，臺灣的商人也掌控其中的絕大部分。又論及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〇年間，由於市場逐漸開放，機會甚多，只要眼光正確，投資的利潤非常高，所以許多學人文的同學，相繼投入創業的行列，並且多數有不錯的成果，我們也預祝他們更加成功。餐後乃驅車入花卉市場，發現市場的情況與臺北建國假日花市的情形類似，不過規模大得多。由於當時是下午，不是市場運作的時間，所以沒什麼人，繞了一圈後，即離開直奔「白雲機場」。

「芳村區」道路中間的安全島上，種滿了紅色的鮮花，又整理得非常整齊、乾淨，如果不細看，可能還會懷疑是假花呢！下午一點左右到達機場，與李先生辭別後，即到八號服務臺辦理登機手續，結果那位男服務員動作太慢，移到隔壁十號服務臺的女服務員處辦理，很快就辦好了。在一點四十分登上中國南方航空 CZ-307 號班機，二點十分離地起飛，到二點三十七分半在香港著陸；轉搭國泰航空 CX-400 班機，於三點五十五分登機，到四點五十六分纔離地昇空，六點〇五分抵達中正機場地面。三人的行李皆未隨機運到，直到第三天纔送回南港。七點鐘辦完行李掛失的手續後出關，八點十分回到南港，結束這一趟匆匆去來，得到不少訊息與友誼的考察行程。

十七、考察心得

1. 就研究的立場言，最大的感觸是資料的蒐集收藏問題。在訪問的單位中，歷史最短，藏書最少的「廣東省社科院」，也有三十五萬冊藏書。中山大學藏書三三四萬冊（件）、中山圖書館則有三七〇萬冊（件）、華南師範大學也有一八〇萬冊（件），這些單位成立多在七十年以上，由於歷史悠久，因此藏書較多。不過這也要歸功於一些前輩學者，如梁鼎芬、容庚、王貴忱等先生的無私捐獻，以及主事者如杜定友先生等的努力。他們收藏的文獻，不僅有難得一見之物，也有別人未注意的平常之物，例如中山圖書館蒐集中山先生各種版本的《三民主義》、相關研究資料、革命宣傳單、募款單等等，以及廣東省相關的文獻，包括一些地方性的短期報刊雜誌，這些刊物在當時並未受重視，杜定友先生等人卻別具慧眼，已經注意到其價值，開始加以收集，到今天反成爲不可多得之物了。其實文獻資

料需要一點一滴的累積，有些現在看起來很平常，毫無價值的東西，在事過境遷後，卻成爲可貴的歷史實證資料。例如：唐、宋以後專門應付科舉的各類參考書、民間常用的黃曆和日常生活參考的通俗書。明末與清末民初的一些宗教性的傳單、善書。清末民初一些爲普及教育而寫的經學教本、當時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或坊間的參考書等等，這些文獻在當時不但不被重視，還有人恨不得一把火通通燒掉呢，但今天想瞭解當時民間文化和傳播的情形，這些應該是相當重要的資料。例如「中山文獻館」收藏了許多討論婦女權利地位的刊物，這些地方性刊物，在當時可能並沒有受到重視，但今天用來討論當時對婦女權益的重視，以及重視的內容，不是最佳的實證資料嗎？因此對前輩學者收藏品的爭取，以及即時蒐集帶有歷史價值的資料，是一個研究單位絕不能忽視的工作。本處成立十年，除同人的共同努力外，也獲得不少前輩學者無私的捐獻，因此有近二十萬冊的藏書，不過相對於廣州這些單位，實在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由於建築物空間的限制，以及部分不知文獻資料對人文學術研究重要性的「官員」之牽制，例如：前任的會計室主任馮瑞麟先生，即以經費的分配關係，曾主張依各所處人數的多寡購買藏書；前任的楊國樞副院長也因為經費的關係，也曾主張「大套書」整個中央研究院僅能購買一套之類。除非另有重大改變，否則恐怕永遠也無法擁有如中山圖書館一類的藏書特色，奈何！

2. 「陳氏書院」的建築固然美觀，雕刻也具有特色，但這是屬於建築史和雕刻史的事。就一個中文系出身的人來看，雕刻出的圖案內容，以及詩文等的表現，毋寧更具有研究探討的價值，因爲它所呈現的意義，有時更在紙本資料之外，可以與紙本資料互補有無，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固定的文本呢。就我粗淺的看法，雕刻出來的民間故事、戲曲故事、詩文等，不但有助於對當時民間傳說、戲曲戲碼的傳播發展情形的瞭解，雕刻上所表現的場景，對當時實際演出服飾裝扮的瞭解（例如本處「後花園」一尊從臺灣南部某座廟牆拆下的李鐵拐塑像，因在日據時代塑造，故頭上綁著日本式頭巾，腳下穿著日本式木屐），應該也有幫助。透過詩文和雕刻呈現的內容，更可以探討傳統中國人的價值觀，傳統中國人對後代子孫的要求與期許，甚至可以探討這種利用特殊建築物的雕刻，加強教育後代的意義與效果。從「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猶望楓橋夜泊時」的詩文及「榮歸故里」雕刻的提醒，「聚賢堂」之名、「昌後世」和「振斯文」的期許，「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的自豪，應該可以看出陳氏宗族不但希望子孫在文化上

有所貢獻，更提醒他們不要忘本。當時廣東人出外經商、移民海外的情形甚多，而祠堂的建築，並沒有表現相關的內容，是否與提醒族人不要忘記入仕有關？或者當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依然佔上風，像現在部分學者所艷稱：清代商人階級自我定位提昇，不以入仕為重的觀點，是否在廣東並未流行？或者因為祠堂本作為「書室」之用有關？這座「家祠」的雕刻內容與其他地方（如徽商）經商家族的祠堂、官宦人家的祠堂，是否有不同之處？雕刻的戲碼與故事是否有地方特色？有那些戲碼或故事具有全國性？或是任何建築物多會有的雕刻？或是某類建築物必有的裝飾？這些都是頗有趣而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3. 王貴忱先生是我們此次考察的奇蹟，因為我們本來並不知道他藏有這麼多清代和民國學人的信函，以及一些罕見的書籍。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王先生這樣的前輩學者，沒有學歷，全憑自修而擁有如此豐富學識，以及如此用心於文獻資料的收藏。不但如此，他還把其中比較重要的資料，毫無條件的捐贈給公家單位，原因是公家的保存條件較好，目的是讓大家有機會作研究。相對於某些公家單位（如本院大家所熟知的某一老所）把公共藏書，當成自己單位的一家之私，儘量設置一些刁難的條件，以阻絕其他人利用資料的卑鄙作風，王先生這種無私的熱忱，實在令人感動。例如：當王先生邀我們觀賞他收藏的清代和民國名人信函後，林老師發現有不少乾嘉學者與近現代學者的信函，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因而請王先生考慮，是否可以提供出來影印成書，以廣流傳時，王先生毫無難色的馬上答應。由於他的無私爽快，倒讓我們嚇了一跳，因為按照經驗，擁有這類孤本的收藏者，如果要讓他公諸於世，影印流傳，除了印刷品質的要求外，多數都會提出一些條件，沒想到王先生如此的相信我們，一口答應。希望這些珍品能儘快出版，必可嘉惠學界，也可以早日讓其他人和我一樣，真實地感受到王先生不藏私而樂於助人的熱忱。
4. 湛甘泉相關遺跡、長興學舍等的保存，雖公告為文物保護單位，事實上並未盡到保管的責任，因而任由無知者破壞、任由雜樹野草橫生，這種形式上重視而實質上不然的作風，實在大有可議。例如增城市天蠶山上湛甘泉的墓地，在一九九二年開會時整理過以後，相信從此就沒有任何一個文物保護單位關心過，所以任其埋沒在荔枝園內，既沒有通路，也沒有指標。我們一路打聽，大多知道有這一處地方，然問起實際的位置，即使住在附近不到二、三百公尺的人，也無人知曉，例如加油站離那裏不超過三百公尺，卻一問三不知，可見當地人對此事的生疏。

我們的運氣實在不錯，正好遇上熱心的吳月堂先生、又正好碰到熟悉該地的鍾偉權先生，否則絕對無法到達該地。回廣州的路上，大家開玩笑說那位鍾先生，可能是湛甘泉感受到鍾彩鈞學長研究他（彩鈞正在點校湛甘泉的著作）及我們遠地來訪的熱忱，特地派來帶路的，否則哪有那麼巧？正好在路邊攔到這位在墳墓邊種荔枝的人，由他帶我們到那處完全隱藏在荔枝園中，被野草雜樹淹沒，不但毫無道路痕跡，甚至看不出原來面貌的墓地。雖然看了以後，實在令人難過，但至少沒有白走一趟。長興學舍的情形更荒謬，如果不想保存，就不必掛保護的牌子。既然掛了「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卻又沒有任何真正的保護作為，而任憑他人破壞，這種表裏不一、非常不落實的形式主義作風，豈非在塌廣州市政府的臺嗎？這種情形令人大惑不解，這種掛著保護的名義，卻任由破壞的意義何在？大陸歷史文化相關的遺跡甚多，本就無法毫無遺漏的保護，但是既然公告要加以保護，就應該真的有保護的作為，而不是掛著牌子就算數，如果一開始就不能落實保護的措施，等到被破壞之後，想再要恢復，恐怕就要事倍功半了，不知廣東省文物保護相關單位的主事者，何以不計及此？惜哉！

5.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事蹟，是從小學就進入腦海的歷史記憶，對這些革命分子、年輕的犧牲者，當時的感受是無限的敬佩、無限的神往，恨不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爲了國家民族，對腐敗的滿清政府宣戰，把那些清朝的官兵全部殺光、一個也不剩。當看著一個個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之際，面對的似乎不僅僅是文字筆劃，而是文字背後那些被埋葬的革命志士，心情也就難免激動，有股說不出的悲愴情緒，在心中隱隱波動，喉頭也有乾澀之感，眼淚似乎禁不住就要掉下來了，令我感動的是他們的勇氣、執著，以及親人的悲傷。但是收起激情，比較理性的看待這件事，如果拋開既有的、被書本塑造的、帶有特定角度的立場。這些死難的英魂固然值得崇敬，然而那些忠於清廷而奮力抵抗的人呢？他們的生命真的是如此低賤、如此的毫無價值嗎？他們盡忠職守的精神，該不該受到同樣的尊重呢？如果擁護日本人的傀儡政權勝利了，第十九路軍盡忠職守而犧牲的官兵，是不是也和那些清兵一樣的該死呢？想著想著，不禁越來越迷惘了，是非好惡如何分辨呢？歷史固然多是勝利者或其後裔在寫，但是真的只能有勝利者的歡呼嗎？真心的盼望歷史上的英雄、烈士，永遠永遠不要再出現，讓我們大家都是同樣的正常平凡就夠了。政治的問題還是：以口水替代血水；以印章取代鋼刀；以選票替代子彈吧！

6. 看到「南越王墓博物館」的整體設計與規模，不得不佩服當地政府的遠見。在十幾年前，大陸經濟並不是十分起色的狀況之下，願意花大筆的資金，設計這一座具有前瞻性的建築物。整個設計在內外部都能照顧到與歷史情境的配合，所以墓地的玻璃棚是「復斗形」、外牆用的是與原墳墓材料接近的暗紅色砂岩。「主體陳列樓」則完全現代化的設計，羅浮宮式的外觀，非常的壯觀，玻璃的建材，看起來清新光亮；展示廳則是恆溫、恆濕的空調設備，以免出土文物受到空氣的影響而氧化。說到遠見，這又使我想到「中山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的規模，一個地方政府肯花這麼大的經費，去做這類現實的經濟回收非常微薄的文化投資，實在令人欽佩。臺灣的地方政府在這方面的眼光與投資，和他們比起來，實在應該汗顏。以臺北市為例：市立圖書館成立多少年了，能與這些地方圖書館比較嗎？我們以前號稱經濟情況比大陸好，但是何嘗有一個比較具有文化關懷的投資呢？也許這就是臺灣「海洋文化」的特色：居無定所、撈一筆就走、缺乏長遠永續經營的打算。從荷蘭人、鄭成功、日本人到現在的政權，不都是如此嗎？缺乏安土重遷、與這塊泥土共存的堅持，正是長存在臺灣人潛意識中的最大問題，也是無法出現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文化投資之重要原因吧！
7. 每次到大陸考察，總會得到許多珍貴的友誼與學術訊息，這次考察多虧林子雄先生、李宗桂先生、戴偉華賢伉儷等的大力幫忙，纔有可能如此順利，也纔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多的交流機會與文獻資料、學術訊息。尤其李錦全教授因無法見面，而託李宗桂教授轉贈我們難得的書籍，更令人感動。更感謝新塘鎮公安局的吳月堂先生、菊泉中學的張洪慧小姐，熱心的協助我們這些遠來的陌生人，否則尋訪湛甘泉之事，可能會白跑一趟了。還有除了王貴忱先生對珍貴文物的無私胸襟，令人欽佩外，像倪俊明主任答應幫忙複印相關資料時，林慶彰老師曾請問他需要多少工資，沒想到倪主任的回答是：大家既然建立正式交流關係，只要不違反相關規定，就要盡力地互相協助，不應該要求什麼提書費、影印費、損傷保養費等等一類的費用。倪主任在第一次和我們見面時，就有這種先進的互助觀念，這在大陸還是第一次聽到，實在令人欽佩。另外林慶彰老師每到一個學術單位，總要設法與他們建立起良好正式的學術交流關係：交換出版品、提供學術訊息、協助提供資料。這對於本處的學術研究與交流活動，有非常大的幫助，諮詢委員會的長輩們，總希望我們的學術研究能「走出去」，不要孤芳自閉，林老師這種努力，應該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希望這些努力用心建立起來的交

流關係，能夠永遠保持，不要因為一時的疏忽而斷線，否則就太可惜，也太對不起我們這些到處奔波的人了。由於大陸幅員廣闊，各地的學術活動訊息，有許多是我們無法得知的，出版的學術會議論文集，有時更是一無所知，更別提選購收藏了，例如上次到泰州市獲得的《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這次的《湛甘泉研究文集》，這些資料對相關的研究，當然具有一定的價值，如不是親到該地，恐怕很難獲得這些資料。再則至今為止，大陸並沒有將全國圖書館所收藏，非善本的清人著作目錄編出來，因此目前很難確切知道清代學者著作的數量、書籍收藏的情形，透過實地考察各地圖書館收藏的情況，不但可以加深對文獻資料收藏情形的瞭解，當需要這些資料時，更可以經由這些交流關係，比較容易的獲得。這對於學術研究的幫助，應該是相當有意義的事，這也就是我們研究經學的同伴們，願意不辭辛勞的奔波考察之故也。

2000年12月20日 AM10：10 動筆

2001年01月12日 PM02：32 完稿

2001年06月15日 PM02：25 定稿